



西洋鏡下

第一集

白杰明著

波文書局

西洋鏡下

第一集

白杰明著

波文書局



作者介紹

白杰明(Geremie Barme)是一位近年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與翻譯家，德裔澳大利亞人，今年二十六歲。

曾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國立大學攻讀語文與中國歷史，後以交換留學生身份先後去上海和遼寧省的大學深造。他非但中國話講得極為流暢，而中文寫作能力和分析事物的見解，尤有獨到之處。

他是《傷痕》英譯者之一，又曾參予“Teng Hsiao-Ping: a Political Biography”的編寫和“The Case of the Gang of Four”的英譯工作。本書是他第一本用中文寫作的隨筆集。風格獨特，輕鬆明快，自有見地，值得一讀。

執行編輯：楊莉君
封面設計：蔡浩泉

西洋鏡下
（第一集）

王水

西洋鏡下

(第一集)

白杰明

波文書局

1981

西洋鏡下

(第一集)

西洋鏡下 (第一集)

目 錄

52 西洋鏡下

- | | |
|---------------|------------|
| 1. 中国管窺 | 怪哉午睡！ |
| 2. 「事媽」與「擇官」 | 「事媽」與「擇官」 |
| 3. 北京的外國記者 | 北京的外國記者 |
| 4. 堅強者，死之徒 | 堅強者，死之徒 |
| 5. 相聲萬歲！ | 相聲萬歲！ |
| 6. 「拿來而拿不到主義」 | 「拿來而拿不到主義」 |

一一二八四一

「婦解」與「思解」.....

養乎？殺乎？.....

「知道分子」芻議.....

「雷池」難測.....

庸俗化的提前實現.....

異樣也是常態.....

史為「四長」.....

西洋記同齊天大聖.....

極左派何止一人？.....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澳洲獵趣

16. 口號與廣告.....

五三

二二
二四
二七
三一
三五
三八
四二
四六
五〇

代溝的膨脹.....

1984 + 6 = 1990.....

澳洲的一家「工人工廠」.....

形象與民意.....

電視警察的禍害.....

中國攝影師所見的澳洲農民.....

從「明華」輪談起.....

旅遊雜感.....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香港捕影

22. 21. 20. 19. 18. 17. 筆名及文責不負.....

26. 25. 24. 中藥西用.....

27. 香港人的「擠」術.....

九一
八八
八六

七八
七八
八二

- 香港——寒冷的夏天 九四
 塑料社會的傑作——快餐店 九六
 試穿針眼樂無窮 一〇〇

31

4

西洋鏡反照

- 美國第一次對讀者的調查 一〇四
 從《火星人》談到《星球大戰》 〇九
 「淫褻語言」和美國的言論自由 一四
 時不再來 一七
 35. 34. 33. 32. 從暢銷書談起 二一
 電子時代的隱患 二五
 西方的現代化迷信 二九

5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扶桑側面

談談「學習小組」 一三二

忘年還是忘我 一三六

日暮里和魯迅 一四一

考試地獄和蜘蛛絲 一四九

日本點滴：競爭和「恥」 一五四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作家與書

試評李克曼著《中國的陰影》 一五七

丁玲與「一本書主義」 一六八

丁玲談養鷄的故事 一七一

丁玲漫話二十年遭遇 一七四

5

李敖

(47)

先生「古」酒人.....

一八八

耳目一新之作——談巴金《隨想錄》.....

一九一

談出國訪問.....

一九六

盛中國訪澳側記.....

二〇〇

51. 後記·鏡下殘照.....

一一〇三

6

怪哉午睡！

記得我剛到北京來上學時，大約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就學到了「睡午覺」幾個字。起初以爲，那是個別人裝滿肚皮，疲倦得不能就躺下來打一會盹罷了。很快就覺察到上述的設想純屬謬論。睡午覺的並非個別人而是一大片。

當然，工廠幹活無法容忍長時間的午睡，公社一到農忙幾乎飯都顧不上吃，何況午睡？看來參與強體力勞動的工作者白天不許睡覺，而那些在外國通稱「白領工作者」和知識分子反而可大睡特睡。當然，我意思不是說腦力勞動者因不是體力勞動，故不應有午睡；我的觀察的結論，就是坐在辦公桌邊的人，往往有爬到桌面上遠遊夢鄉的機會。

在大學裏當學生時，其實我也很能享受午覺的福。有了這個習慣以後，我自食堂回宿舍，就一定要躺一下「看書」。書看不到十分鐘就要入眠。其他同

學亦如此，但因他們對午睡本無戒心，故從來用不着用「看書」來掩護他們的意圖。

這次回北京，因經常去一些大單位辦事，有時因時間安排不周，就在中午時分登一下三寶殿。遇到的景象，讀者大約難以想像，只好請您回憶上次看災難片時核彈爆炸後的那些人體縱橫的鏡頭，就差不多是那麼個樣子。照我的經驗，一般單位（甚至「高級衙門」在內），有個從沒有人正式通過的規定，即提早吃午飯，醒後再上班。前半句的意思很清楚，後半句需稍加解釋。意思是不要死死地定一個下午上班的時間，要照顧同志們的玉體。打斷人家的熟睡，可能對其神經有不良影響，因此最好按自然規律，等到人家主動起身再上班。當然，此無明文規定，沒人會給您講；若您懷疑，請來實踐一番。

今天上午到王府井去逛新華書店，高興地買到了一本重版的鄧拓《燕山夜話》。一回住處就翻開書本看。頭一篇雜文的題目是《生命的三分之一》。（鄧拓根據顏師古的註解：「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共四十五日。」認為

夜晚佔人的生命的三分之一。）讀後想寫點感想，所以伏案疾書了一陣，將上邊的幾句話寫出來了。鄧拓去世已有十三年。時移境遷，當時能把人的生命分成三部份時間，現在不然了。可能是因為時代進步了？生活多樣化了？照我的想法，在中國，一個人的生命可分為四部份了。談到這兒有點倦。我亦贊成一個人「入鄉隨俗」，我就要去「看書」看一會，看一會恐怕就大有「閉目養神」的可能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

「事媽」與「擇官」

語言是個變幻萬千迅速發展的東西。某些語言能夠直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某些特徵。在香港這樣一個極其商業化的社會裏，新的詞彙往往從廣告和商業活動演變而來。記得我剛到香港時，經常從電視看到一種洗衣粉廣告。廣告的配曲裏有句「污糟辣撻（邋遢）冇問題」。過不久，這句話在社會上就很流行，甚至到現在，經常還會有人脫口而出：「污糟辣撻冇問題。」中國內地的語言也是富有變化和發展的。新詞彙的主要特徵和社會特徵有密切關係。搞了幾十年的全國性政治運動，語言也不免受到政治的影響。比如說，幾個人在一起要去一個地方，一個人不同意，其他人如要強迫他去，就會開玩笑似的說：「算了，去吧。我們要『專』你的『政』。」這樣，一個含意十分嚴肅的詞彙，就得到「創造性」的運用。

前一段時間上北京去玩，有一天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坐一坐。正好是禮拜天，全家的人都在。談到北京近幾個月的變化時，一個現在上大學讀英語的青年突然問我：「叔叔，你知道『事媽』（北京人讀作：事兒媽）是什麼意思嗎？」這個問題可把我問住了。他哥哥就開腔解釋一番。原來，「事媽」此詞是在北京比較流行的新詞彙。那意思是指「多事」或「愛管閒事」的人。雖然有人經常說，南方話的粵語是中國方言裏最豐富多彩的，不過，我在北京住過一段日子，覺得北京話並不比粵語遜色多少。或者是各有千秋吧。

其實「事媽」的出現，也並非偶然。在幹部衆多機關林立的北京城，「事媽」會派得上用場。舉例說明：想給某部門（不是保密部門）的朋友打個電話，商量禮拜天到北海公園去玩的事。爲了不要在辦公時間打擾，就在吃午飯時打。幸而總機還沒下班用膳，說了分機號碼，他二話沒問就給接上。到第二關就碰上釘子了。接電話的人要問長問短：「你找誰？……是哪兒的？……什麼單位？……啊？（他裝聾了！）……喲……那，你跟他是什麼關係？（關他

什麼事？豈有此理！——我開始火了）你找他有什麼事？……」這時我就忍不住跟這位理論一下。結果發現，我那個朋友已經下班了。但這個把「關」的人還想「了解一下情況」，對我糾纏不休。這種人就是「事媽」。如果對他說幾句幫助他「端正作風」的話，他就很快，——咔嚓一聲——把話筒放下了，完事大吉。

在北京到各種機關去找人，總會碰上不少「事媽」式的人。據說「事媽」相當「離譜」者則稱爲「事媽委員會主任」；「事媽」到極點的人，則叫做「事媽中央委員會主席」。聽說，北京有些機構自己又專有一批「小事媽」的人，去跟其他機構的「事媽」打交道。不然的話，那麼多人管事，就沒辦法把一件事辦妥。

前幾天到書店買了一本《貞觀政要》回來。作者是唐代史學家吳兢，當過諫議大夫和修文館學士，可說是對官場千姿萬態相當精通的一個官員。《貞觀政要》是貞觀年間（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唐太宗與高級官員討論施政的紀

錄。在第七章「擇官」裏，記載太宗對房玄齡的幾句關於擇官的話：「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爲？」雖說的是大官的選用，這些話也適用於各級官員的選拔，對今天來說，就是幹部的選拔。事媽多，可是，「不善者縱多亦奚爲」？結果是可以辦得很順利的事，反而弄得甚爲拖沓。小事如此，大事何嘗不然？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

抄

北京的外國記者

中共的新聞報道一般是根據「上頭的精神」而發的。駐華的外國新聞記者就常常因為自己的「新聞觀」同中共官方的「新聞觀」有較大的出入而發愁。雖然有一部份外國記者為了表示對中共的友好態度，僅遵官方的意旨而行，不敢跨越雷池半步，但也有相當一部分西方記者，他們除了發佈一般性的新聞消息外，還想及時而如實地報道這個東方社會主義大國的社會現實和動態。

按說，這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却是非常冒險的；弄得不好，真是吃不完兜着走。前幾年中國發生的「安東尼奧尼事件」，人們記憶猶新。安東尼奧尼到中國，只不過是拍了一些不大能夠反映「中共大好形勢」的鏡頭，却攬動了一場軒然大波。當時中共的輿論界，真可謂是「鳴鼓而攻之」的，把安東尼奧尼罵得狗血噴頭，安東尼奧尼雖然已回意大利了，還大有「聲討羽書飛瀚海」

之勢。打那以後，不受中國官方歡迎的外國記者，又有了一個新頭銜，那就是「安東尼奧尼式人物」；而打那以後，北京人對外國記者也就更加敬而遠之了。

那是發生在「四人幫」當道之時。可是，「四人幫」垮台後又怎樣呢？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共《參考消息》發表的一則外電新聞稱：「一位在北京的高層幹部對一位外國記者說，中國人可以比較隨意地和外國人交往。」這時，就開始有人主動地找外國人談話。北京民主運動興起後，即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七九年初，曾被認為最容易招禍的跟外國記者往來的舉動，則變為一種時髦。多年來不能直接跟中國的一般羣衆接觸的外國記者，忽然間被爭先恐後地要跟他們交談的學生、工人、農民和幹部包围……

對此，外國記者中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和反映。一種是怕跟一般羣衆接觸太多會引起官方的注意，不願經常在民主牆下的熙熙攘攘的人羣中出沒，而樂意留在自己的公寓裏拿翻譯員給他的中國新聞譯文當作主要消息來源。但在駐京

的記者中，也有一種人覺察到民主運動對於中共的重大意義，並認識到這是他們蒐集第一手資料的好機會，因此，經常冒着凜冽的冬夜，不顧料峭的春寒，頂着熱氣逼人的炎夏，到民主牆下，到人羣之中，採訪生動的資料，觀測運動的動態。

這其中，幾名最突出的「街頭記者」是加拿大《環球郵報》的傅瑞哲(John Fraser)、「法新社」的德龍(Flancis Deron)和畢安尼(George Biannic)，以及英國的威德(Nigel Wade)。通過這些「街頭記者」，北京民主運動的實況在幾十家西方報紙上經常和讀者見面。中共建國以來，政治活動有如此詳細的外國新聞報道，還是第一回。

一九七九年三月底四月初，一些「人權分子」，被北京公安局逮捕了，嚇跑了。民主牆開始冷落了。而被逮捕的人當中，有些正是這幾位「街頭記者」在採訪中結識的朋友。在五月份北京公安局開會討論這些被捕的「人權分子」的問題時，點名指責這幾位「街頭記者」，斥之為「國際間諜」。這些外國記

者挨的是新棍子，戴的是「舊帽子」(「國際間諜」一詞是官方以前慣用的對不受歡迎的外國記者的罪名)。

現在，駐華外國新聞記者又都恢復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以前他們的那種「寓居生活」了。

最近，加強民主、實行法制，被寫進了中共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決議，那麼，在民主運動中被逮捕的「人權分子」也會分享民主與法制之惠而得到釋放，或合情合理的處理吧。什麼叫「國際間諜」，也應該有個法律準則了吧。建議有關方面今後應該在外國人中劃清朋友與敵人的界線：與中國為敵者，應受合理的處置；非與中國為敵者，應被視為友人而獲尊重。只有證據確鑿，才好奉送那頂帽子罷！

(一九七九年八月)

堅強者，死之徒

司馬遷

中國政治史上非常讚頌忠臣清官之類的人物。像唐太宗時直言不諱的忠臣魏徵，以不少美談垂留青史。在清官方面，恐怕較有名氣的二位是海瑞和包拯。尤其海瑞，不僅在歷史上以廉潔正直著稱，即在文學作品裏，亦頗佔地位。遠的不說，二十年前中國史學家吳晗不是因爲一齣《海瑞罷官》而馳名中外嗎？

因爲頌揚剛直不阿，爲民請命，吳先生就落個「三反」帽子，被迫含冤致死。吳晗不白之冤已得到平反，十幾年禁演的歷史劇重上舞台，劇本也重版了。從前一直沒機會看看吳晗的這個劇本，突然間薄薄一本綠色封面的書，在香港的書店出現，我就趕緊買了它一本，而且一回家就看。短短的歷史劇劇本不到一會就看完了，覺得海瑞這位老先生，挺像我從前在澳洲高中時所接觸過

的一位希臘帝王，那位帝王我也是在劇本裏「結識」的，甚至直到今天還會出現腦海。

希臘帝王就是與孔子同時代的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約公元前四九六—公元前四〇六）《安提戈涅》（Antigone）裏的克力安（Creon）王。克力安的兒子叛變了，帶兵攻打父親的城堡，終於戰死。死後，按古希臘的禮節（希臘的這套玩意複雜得要命，並不比中國遜色），父親該把死掉的兒子埋掉，但是老皇上寧可被「槍斃」（這麼說是爲了強調，讀者切莫誤以爲古希臘如此偉大，竟提早二千多年發明機關槍！）也不肯把兒子埋掉，戲是個悲劇。最後克力安悍然違背「天規」；皇后、女兒都死去了，自己眼瞎而失掉寶座。這幕戲是「一場戲」（共三幕）之一幕，現在還有人演。記得我在高中讀這個劇本時，附近大學的劇團就演過幾場索福克勒斯的悲劇，所以從舞台上也可見到克力安頑固的可悲下場。

講這麼多古戲幹嗎？到底索氏筆下的克力安跟吳晗先生的海瑞有什麼關

海瑞

安提戈涅

海瑞

係？雖自職位來講，克力安與海瑞一君一臣，文化背景和時代也相去很遠，不過在性格上倒有點相似。克力安覺得兒子反叛，傷天害理，不該按當時禮節埋葬，因此弄得家破人亡；海瑞剛直不阿，不顧一切地把退休宰相徐階兒子——徐瑛判了死刑，並且強令其父退田。兩者在其性格堅強上，甚為相同。結果兩人都因過分堅強而失勢。確如老子《道德經》所說：「……堅強者，死之徒」。索氏好像也懂這個道理，《安提戈涅》唱詞裏就有這樣一段：「河流裏之蘆葦強硬者必被沖斷，柔軟者順流而活。」說的是蘆葦，指的是克力安。海瑞這位典型清官也像一根蘆葦，俱是「死之徒」，他強硬的是「執法持平」。其實他若真正要「爲民請命」，他就不該爲徐瑛一事而給徐階背後下毒手的機會。從民衆利益而言，海瑞多當幾年應天巡撫，繼續爲百姓做些好事，比他那樣做而讓新任官吏胡作非爲要好許多倍。但我想海瑞頗有歷史眼光，《海瑞罷官》裏有這樣一段唱詞：「清名千古水流芳」，說不定他除了爲民着想的一面外，也有將來會有人爲他寫劇本的預感！

(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相聲萬歲！

在文化革命期間到中國去旅遊的一般外國遊客常說，在他（她）們印象中，中國人雖然經常微笑，但很少放聲大笑。遊客們所看到的文藝節目亦很少有能夠令觀眾發笑的東西。結果是海外的人都以爲中國人沒有「幽默感」。

讀者看到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一定會搖頭歎息。本來非常愛笑的人，怎樣給弄得好像笑聲是一種罪行呢？先談華北幾百年來盛行的一種民間曲藝形式——相聲。在十幾年的文化獨裁下，相聲的靈魂——諷刺，被列爲「四舊」，所以相聲只好改爲「歌德」派小子們的一個「文藝武器」，只准暴露敵人，不許嘲笑朋友。不管相聲表演者如何絞盡腦汁，除了一些像《雷鋒頌》《友誼頌》和《海燕》之類的「催眠相聲」之外，封建社會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所能摧毀或窒息的相聲，反而在「四人幫」的「社會主義」（中國內地許多青年

稱之爲「封建法西斯社會主義」）年代被迫瀕於覆滅的邊緣。

筆者對相聲印象較深的原因，是因爲在東北讀大學時經常被好心的朋友拉到台上，跟一位名叫市川眞的日本同學表演相聲。當時不叫聽衆笑的相聲（像《雷鋒頌》）到了我們兩個外國人嘴裏就變成壓台戲。原因很簡單，我們把「四人幫」時期的相聲角色甲乙○都變成相互嘲笑與諷刺的形象。當然，我們如此做在當時可算大逆不道，是對某某老兄的文藝理論的歪曲，對某某阿姨之取笑云。但我們畢竟是外國人（所以相當有特權），若不搞得太過分的話，在舞台上我們還是較有自由的。其實如此做，雖把一個枯燥無味的節目變得稍微活潑一點，兩位表演者却弄巧成拙，要一演再演！每逢節日或什麼文藝晚會，總會有些搗蛋鬼要把我們兩個外國 Stooges ○拉出來說一通相聲。這段經歷差點把我們弄到曲藝團去當學徒呢！

自一九七八年底中國的相聲開始露出其原來的特點。七七年的諷刺四人幫的相聲（如《三打白骨精》、《帽子工廠》、《鋼鐵公司》等）是相聲翻身的

序幕。一九七八年底的《如此照相》在配合批判極左政治路線同時，亦充分發揮相聲的傳統特點。其中的語言運用，尤其令人感到高興，當時聽衆無不捧腹大笑。一九七九年春節前後，相聲開始對很多社會現象加以諷刺，博得了全國聽衆的熱烈喝采。其中較有趣的一個相聲是《霸王別姬》。這個相聲通過對一個中級幹部的諷刺，深刻地揭示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巨大而嚴重的問題，即是幹部利用職權搞特殊化。雖然相聲本來只是華北人所愛的曲藝，近幾年來，相聲及時而鋒利的諷刺，竟使它在全國各地都受到歡迎。《霸王別姬》和五月間出來的《假大空》，切中時弊，諷刺了受「四人幫」毒害的新權貴；我以爲那是促進中國文藝思想和創作開放化的、一種有極多羣衆支持的文藝形式。

相聲並沒死，相聲萬歲！

○相聲演員甲乙，即指「鬥眼的」與「捧眼的」。

○西方滑稽演員的配角。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

「拿來而拿不到主義」

自從魯迅在一九三四年發表他的《拿來主義》（見《且介亭雜文》）以來，世界各國的種種「拿來」與「送去」主義層出不窮。

近幾十年來日本自「送去」戰禍迅速轉為「拿來而模仿發財主義」的國度，香港變為一個「誘來加工，廉價出售主義」地區，澳洲有世界上罕見的「拿來徵稅徵死人主義」。恐怕現在只剩下兩個純粹「送去主義」國家，蘇聯與美國。雖然其所送去之貨色各有不同，在國際外交和經濟上影響仍為大同小異。往後只期望兩個大國多多相互送去「禮品」，少在他人國土上發「慈悲」。

在各國大顯其「拿來送去」神通之際，具有四千年嚇人的文化傳統的古國——中國，在幹什麼呢？遠的暫不提，引進先進技術也不說，先談談大家所熟

悉的廣州市。自辛亥革命以來，廣州市可以說是一個具有革命傳統的大都市。在此之前，廣州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被迫開放為商埠一事，早已奠下其雄厚的「拿來主義」的基礎。作為一個外來影響甚大的城市，在現在中國向外重開大門的今天，必然會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因為廣州離香港近，外國貨物和影響極容易傳去。結果，雖然香港仍充當中國的大「櫥窗」，廣州却已成為全中國朝外的主要「望遠鏡」。自彩色電視機和電子計算機到新的服裝款式和水晶手錶，廣州樣樣俱備，甚至在一般的馬路和街頭有無數的「模特兒」推廣之焉，用之焉，穿之焉，或表演之焉。本地甚至外省來的人，即在旁出神地和盡情地觀摩。故雖然廣州市的市民「拿來」了不少玩意（大多數是親友自港澳或海外帶回去的），但亦有許許多多的人民對已「拿來」的東西，觸物生情，不禁遐想：他們因為無緣（即無關係），始終是望見而拿不到。這種「拿來而拿不到主義」會令一般好心的觀察者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憂慮，心裏不免產生一個「拿來而拿不到還不如拿不到而見

不到」的念頭。

廣州（北京和上海亦有上述情況，但尚未達廣州的高超程度）的幾個地方，還有另一種「拿來而拿不到主義」，即外國酒等貨物以外幣出售的現象。不談此做法如何跟蘇聯相似，亦不論穗市所設的各種內部商店如何，光就這做法對一般民眾心理的影響，恐怕不是嫉妒就是憎恨。此事甚值得考慮。

（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

「婦解」與「思解」

近十年來西方各國出現了一個新的婦女解放運動高潮。雖然這個運動的重要性已被社會上的許多人和團體所承認，但至今對許許多婦女而言，「婦解」還是一個遙遠的奮鬥目標。

看來，西方的社會運動和中國的政治運動，雖然在動機方面經常有所不同，但貫穿着這些運動的發展、高漲和收尾的規律，恐怕大同小異。一個運動往往由一個或幾個人、或一個地方發動，得到社會上民衆的共鳴才擴大。剛剛出現的運動會有其突破性，會有一種「新鮮勁」。在這一階段，運動最易出現偏差，但在社會上和羣衆頭腦裏，這却是傳播最快而影響最深的階段。蓬勃了一陣之後，就會有各種別有企圖的人乘機撈一把。本來是反對者，搖身一變，這時也出來雙手贊成了，或指責他人對他們的「誣陷」，大講特講其誠意，自己

如何在暗地裏對運動的大力支持云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是運動「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的階段。這個階段可算是運動的末日。各財團這時就盡量利用對運動有好奇心的人來發財，把運動的進步意義、突破性和活力淹沒在算盤的聲響中。

可以說，現在婦解運動的浩浩蕩蕩之勢已經消逝，而被一種普遍的冷淡所代替。當然，幾年的運動在許多婦女和男人當中亦有相當的影響。起碼可說，雙方（婦解主張者認為男方是壓迫者，女方是受壓迫者）的覺悟普遍提高了。在中國的「批林批孔」雖然有人說是一無是處，我以為其實亦起到了一個提高社會覺悟的作用。但不論是西方國家或在中國，現在還是需要對近數年來取得的進步，加以充實和鞏固。

中國婦女地位之提高，亦非一日之功所可做到。頭腦凍得如此僵硬，非幾百年之寒也！江青參與政治陰謀和她的下台，在國外對中國婦女的威望沒有任何好處。記得「三點水」（江青別號之一）下台，羣衆性的批判運動剛剛發動

的時候，海外有不少男朋友指責婦女講：「這就證明女人衝動，不懂得處理國事。」正確與否，我沒資格詳談。

我認為，江青的政治錯誤若說是跟她的性別有直接關係，毋寧說她也是一個封建主義思想非常嚴重的人。中國婦女最可悲的一點，在於誰若真要出個頭，掌點實權（有名無權者近來甚多），就非得「厲害」不可。江青的「瘋癲」，她的醜惡，皆有深遠而複雜的歷史根源。江青這一類人的掌權和大施淫威是有緣有故的。光「批倒批臭」，雖可得一時之痛快，對中國民眾認識（和領導人物的認識）的提高，並無大作用。在議論「四人幫」公審的這些日子裏，我覺得還是應該自心理學的角度去研究「四人幫」及其時代。不但要剖析「四人幫」的思想，亦應該研究其思想得以泛濫的原因。對江青的出頭露面、八面威風以至墮落，亦應該自婦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男子對婦女的利用和態度去研究，不能光說江青是現代的呂后、武則天就了事的。總之，婦女解放運動若要繼續起其作用，男人和女人都需要一點「思解」——思想解放。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養乎？殺乎？

近二年來，隨着政治局勢的開放化，中國旅遊事業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光從人數來講，去年和今年去中國遊覽的海外華人及外國人，比近三年來的任何其他時間還要多。幾十年來由於各種不同原因而不敢去中國的人，現在爭先恐後，搶機會遊覽一下萬里長城和北京故宮等名勝古蹟。但遠景並非形勢一片大好，而是問題「好大一片」。

自外行的角度來看，旅遊不是複雜的商業。但稍微瞭解其內在複雜性的人，則會認為這是一筆十分棘手的生意。組織幾十個人的旅行團體到某處去玩，雖然看起來是一個生財之道，但從訂飛機票、訂各地酒店以至保證各種旅遊項目的順利進行，已變成一門電子化的科學。旅行團愈大，一個小錯誤或誤差的影響就愈厲害。若要在一個地方多耽誤一天或半天，可能在整個旅程安排

上，產生連鎖反應，對遊客、對旅遊公司都會造成許多不便。冬季旅遊客人較少時是如此，到春夏季各國「好動者」活動起來時，更是如此。

自去年中國開始推行新的經濟政策以來，賠錢而不振的中國旅遊業很快就受到官方的重視。不久，國外的許多觀察家就把中國旅遊業看作中國局勢變好的較可靠晴雨表。中國將向國外貸款、創辦聯合企業、大量引進外國設備等等新聞，是首先由於聯繫着旅遊業發展而傳開了。這樣看來，經濟利益跟旅遊有相當大的關係。

現在中國在搞賺錢的旅遊，一個根本的方針問題突然出現在許多外國人面前。那問題就是：中國旅遊事業是養鷄取卵，還是殺鷄取卵？

這養鷄或殺鷄取卵，對現在的不少經濟問題大有影響。中國現在趨向於大力發展全國各地的旅行網（可以近數月新開放的城市與古蹟為證），當然對整個的國民經濟會有促進作用。不過若想利用外國人幾十年積累起來的「遊華熱」來發財，短期內中國外匯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自長遠而言，這樣對待遊客

不會有多大好處。

從去年起，中國旅遊業興高彩烈地把各項旅行服務費加了又加，把中國的「對外收費」提前闖入現代化國家行列裏去。可惜，在高興之餘，亦有些頭腦清醒的人認識到處處向外國遊客伸手要錢的利弊。簡而言之，如果在中國旅行收費貴，服務差，再有錢的外國佬也不會來受「二茬罪」，再遊中國一次。如果這樣，好端端的、初見興旺之兆的旅遊業，就很可能在喝彩聲算盤聲中，消失於無影無蹤。此外，再過幾年，中國造了幾間合資大酒店後，外國遊客就會嫌其費用昂貴，寧可週遊歐洲或東南亞，那又大又洋的酒店租給誰用？難道到時再開全國學大慶會議，讓各地代表住一住豪華酒店享受一番嗎？若真要這樣的話，中國旅遊業會自一個「養鷄取卵」的合理途徑，走上「殺鷄送卵」的可悲邪路。養乎？殺乎？謹盼有關清官，明鏡高懸，判別「財星」的正反兩面。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知道分子」擣議

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經常會遇到這麼一個角色；不管是多麼深奧或難辦的事情，他總是說一聲：「我知道」。這種人，自命不凡，把別人最善意的勸告也置於九霄雲外。這種人世界各地都有。德國人稱之為「Besserwisser」；英國和美國人稱之為「a know it all」；澳大利亞人則以「smart-arse」（聰穎的屁股）冠之。中國亦不缺少此種角色。中國四千餘年之歷史，實在給予這種自以為是的人，一種產生並茁壯成長的特異條件。經過長期觀察，筆者謹建議從茲以後，可把這種自稱無所不知的自命不凡者稱做「知道分子」。

幾十年來，中國的書生已演變成一個與過去封建時代「學而優則仕」完全不同的階層。現在對一般稍微有點學歷或有知識的人，普遍稱為「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就其社會地位和作用而言，與許多其他國家知識分子並無許多

不同的地方——（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革命十年中受到的「特殊待遇」則屬例外。）不過因為種種原因，恐怕這些原因是離不開「封建」二字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是最容易走到極端，而變成「知道分子」的。

知識分子下降（不是昇華）為「知道分子」，並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而在中國，「知道分子」不僅僅有知識階層出身的人，實踐證明，知識愈膚淺，愈有可能成為「知道分子」。這就是說：「知道分子」文人有之，政界亦有之，甚至工人農民亦有之焉。「無所不知病」在沒有發展到瘋狂程度之時，那表現只限於個人的傲氣，不講理，不理睬他人，甚至時而欺凌他人等等。但「知道分子」的思想習慣一僵化，那就會變成他（或她）的性格特徵。在「知道分子」沒有權勢時，他的毛病雖然會引起人們的反感，却具太大的破壞性。

可能是由於中國文化之悠久，亦可能是中國近代史的悲劇頻繁，反正「知道分子」得勢後大發淫威的不少。其破壞之大、影響之深，真令人望而生畏。

現在中國不斷地咒罵文革期間「四人幫」和打砸搶分子，如何如何踐踏法治，破壞社會秩序，其實，張春橋以「正確路線」自居，只不過是顯露其「知道分子」病情之如何嚴重罷了。「四人幫」及其幫兇中的「知道分子」症已發展到了極點。他們自作聰明、自以為是與剛愎自用，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他們有權決定：什麼話可登報？什麼電影和戲可上演？小朋友可唱什麼歌？大人准講什麼話？他們曾經企圖利用現代化的傳播媒介和封建法西斯統治——新「東廠」制，來取代九億中國人的大腦。這不是「知道分子」無所不知病的大發作，又是什麼？

現在「四人幫」已倒台三年了，但患有這種毛病的殘渣餘孽或中毒較深的人，並未收斂或下台。他們這班人是非壓抑別人不可的，非不聽忠言不可的。結果是這些「高級的」「知道分子」，只剩兩個出路：一是「駕崩」，二是被批倒。可惜他們沒有主動認錯並交出烏紗帽不幹。現在中國發揚民主，比較開放，那些「知道分子」會不會受到一點感染，而主動懺悔，受他人監督，為

「異己」做出少許有益的事呢？咳！做到這點恐怕甚難甚難。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雷池」難測

在古代軍事上，河流、湖泊和沼澤地都有戰略作用。現在亞洲和歐洲的許多國家的國境線，都以河湖為界。甚至一國的州或省的交界，也有很多是由河湖形成的自然界線。

以水劃線的情況很多。這在各國語言上，亦常有表現。如在歐洲語言裏面就有凱撒渡過盧比康河（一）的典故。公元前的羅馬並不是一個大帝國。原先以羅馬市為中心的意大利聯邦是個共和國。但內部和平和富裕，或其他原因，導致了一個擴張政策，羅馬軍隊將領的重要性和他們權力膨脹非凡。到朱理安家族的英杰凱撒，軍權已經成為羅馬政治的最基本而最棘手的因素。凱撒在意大利以北的歐洲大陸上，鎮壓野蠻民族的騷動後，就駐紮意大利北郊。因為羅馬的元老院已知道凱撒可以左右政局，他們就叫他留在邊疆地區，不必南下。他們

也指示他，不准帶部隊渡過北意的盧比康河。他一渡河就等他「起義」。以下說的已成爲比較熟知的歷史了。凱撒果然帶了幾萬人的軍隊渡過元老院的「禁水」——盧比康河，佔領羅馬，建立了歐洲的最早帝國，羅馬帝國。

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渡河，雖是兩千年前的事，但歐洲許多國家還用「過盧比康河」這個典故，作爲改變或取消前議的意思。「過盧比康河」這個典故，跟中國話裏面的「越雷池一步」相似。

在每一個國家，甚至每一個個人的歷史上，總會有幾次關鍵性或有深遠影響的時刻，國家、民族、家庭和個人都得「過他的盧比康河」。主要的問題並不在於「過」「不過」或「越」「不越」那一方面，而在於能夠平安無事的越過這一方面。能夠「過」去的，有時候並不由渡客自己決定，時常受自然條件的限制。有時在河畔站着，往彼岸眺望，可能會覺得水不深，流不急，可以安全渡過。但有時候水流會迷惑人，顯得清澈見底，但要是想過，就難免遭遇水的衝力，無從平安的渡過。

一個國家或個人越過雷池時，有時只能越一步或幾步，有時在一鼓作氣之下，可以連續跨步向前。澳大利亞首都附近就有個大湖叫喬治湖。雖然它同中國的「雷池」無關，但喬治湖有個令人奇怪的特點。喬治湖水，漲落不定。幾月不下雨，喬治湖突然間還會猛漲。連續下幾星期，有時亦不見大湖水位漲高一寸。

上邊談的「雷池」，我就覺得有點像喬治湖，時漲時落，但沒準兒。在這種難以測量的情況下急需過河，或越雷池的人，就不得不納悶。如果看看水勢，覺得可以過，但在渡河時突然來了洪水，把人攔住或使人翻個觔斗，難道渡客就有罪嗎？如若想渡河的人，因爲水位不定，渡口不保險，而決定不渡，難道要怪他（她）保守嗎？但談這些已沒有什麼必要了。現在是八十年代，大河大湖的水位總可被水文科學控制。決定水位高低和漲落的，是人不是天。如果現在有人在渡口時被阻擋或被淹沒，這只能怪管理和控制水位者的大意或狠心。如果連個水位都控制不好，恐怕受驚的渡客們，會懷疑很多很多

東西的。

○據史書載，公元前四十九年一月，凱撒利用羅馬共和國危機，率領十三個軍團和輔助軍隊，渡過行省和意大利交界的盧比康河，迅速向羅馬推進，終使共和國傾覆。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

庸俗化的提前實現

在中西兩個新年之間我有閑暇考慮八十年代頭一年的額外收穫：乃庸俗化在中國的提早實現。其餘四化將要經過全中國人民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實現，但看來庸俗化却不用舉手之勞即可登台亮相。

我如此沒有保留地肯定「庸俗化」隆重出現可能會引起一些朋友的非議。但我的話是有充份依據，並非無稽之談。請讀者們掏出西歷新年親友相識寄來的新年卡觀察一番。收到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的現代化美人手捧國產品的讀者們可算三生有幸，此套新年卡是我認為的一九八零年的「中華洛可可式藝術」創作的冠軍。無緣看到這些三乘四吋令人哭笑不得日曆卡的人，真錯過自我刺激的好機會。請您們在腦海裏讓一個長形金邊的塑料卡出現。其正面應為一個中不中，西不西的女人像：嘴邊帶有吃死老鼠後的血迹（即口紅），面頰浮有紅

雲；頭髮有一個好似在理髮店坐上了大半天時間的亂鵝窩狀；髮上、脖子上、手上的寶石首飾要你想出一大堆，這樣您腦海裏才會活現新「三吐出」（看完後一天的三頓飯都要吐出來）創作歪則陰影下所擺佈出來的八十年代美人。但這個日曆卡的形象尚不夠完美。您還得在想像中看這個中西合成人手裏拿煙捧酒的樣子。若您想當良好公民不贊許煙酒的蝕化作用，亦可把女人手裏的酒換成各種出口罐頭食品。穿帶參加宇宙小姐比賽標準服裝的女人形象就如此拿來捧去中國出口的種種食品和飲品。這種日曆中外流行可謂出低級趣味商業宣傳勝利的一個令人窒息的標誌。

讀者可能因為我的過分抨擊和渲染感到奇怪。日曆卡事雖小，但我相信是代表一個在中國頗有影響力的審美標準。在世界文化史有卓越地位的中國如今泡製出種種庸俗難堪入目的「藝術品」，是件值得口誅筆伐的事。更令人髮指的是中國的商業藝術家們搞的東西也並不是什麼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塑料劣作，而是一些復活了的三十年代 *art nouveau* 作品的庸俗化玩意。

其實我並不是什麼藝術鑒賞家或評論者。不過中國八十年代的腓力斯鑒賞審美標準①，並不應當獲得默認或贊許。區區日曆卡其實可笑得不足掛齒，但現在若您去內地探親旅行，您會發現在青年當中就盛行一種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這種文化的特点是小資產階級（*petit-bourgeois*）的個人主義和個人享受思想。在許多城市青年看來，走向四化的路上就該盡量撈稻草，今朝有酒今朝喝的思想普遍，難道連新年的日曆卡也要反映這種學洋人而學不到家的思想嗎？最使人深思是在像劉賓雁和白樺這兩位勇敢地寫干預生活作品的作家受「上級」的善意「勸告」同時，有關的政治鑒賞家們就批准了這些「干擾生活」的庸俗化傑作的印製發行。天下難事莫大於官心難測哉！

①腓力斯人（Philistine），指《聖經》裏的腓力斯人，乃歐美澳各國用來指市儈或庸俗的東西或人。

（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六日）

異樣也是常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方各國社會不斷地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個人主義。起初這種以個人的性格、經歷和思想情感異於他人的個人主義，被人們視為社會異態或異樣。但到現在，「異樣」或強調自己與其他人不同的某些特徵，已經成為西方社會裏的時髦，甚至常態。

就舉長頭髮為例吧。六十年代初披頭士和繼而出現的滾石樂隊是以長髮為特徵的。當時歐美家長們，哭天抹淚，恨不得有一種吆喝住其子女不讓頭髮長得長的本領。留髮乎？剪髮乎？為此種爭吵而分裂的家庭，數都數不盡矣。好像除了豬仔灣事件，冷戰，太空競賽和越戰不斷升級之外，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注意力就由這個無辜的頭髮奪去了似的。

為孩子長髮而生氣歎氣的家長們，不僅反對長髮的不衛生，而且更反對自

己的孩子長得有點異樣，生怕為社會所不容。當時長輩的最強有力的論點是：別人沒有留長髮，所以長髮是社會所歧視的。可是，留長髮的人却不接受社會的基本規則，不按社會公認的做人標準生活，故雖不會被人趕走，但一定不會受到社會的歡迎的。

二十年過去了。社會的劇烈變動也隨之減少。日久天長，長髮原有的反抗含義也消逝了。長髮不再是異樣。長髮變為人人想趕的一種時髦。頭髮這東西雖然小而細，但它二十年來在西方社會上的作用並不小。頭髮的社會「地位」，自下層人的頭頂至上層人士的頭頂，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從它的演變看，西方社會已經學會如何容納、利用和改造各種有異於常態的東西為自己所用。這個能力不僅限於髮型和衣着上，亦在科技、商業、學術和文藝各方面有所表現。容忍與利用「個人主義」、「特殊現象」和五色繽紛異樣的東西，並有意的引導其發展，是現代化社會文明的特點和它的最大潛力的所在。

現在很多尚未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往往認為，西方的外表是跟內在實質



一致的。這種捕風捉影傾向，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有着不同表現方法。一個窮國開放了，向外國學習，就容易生搬硬套地把國外許多表面而浮滑的現象，看作本質性的東西來學。結果往往是這種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在別國就不能維持長久，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還會引起事端和不安。在本國社會沒有「根」的東西搬進來的愈多，後日發生的「有組織的排斥」會愈烈。所以光模仿一些外表的現象，在短期內弊端不會太大，但時間長了，社會沒有從政治、經濟、意識各方面的變化，顯示其能吸收消化新的外來物，恐怕難免飽嘗物極必反的苦頭。

據我所知，中國近一年半來的社會上怪現象層出不窮。有的因有人看不慣或聽不慣而被壓抑；有的則無可奈何聽其發展，甚至泛濫。但在此中最關鍵而有長遠影響的不是一些長頭髮和奇裝異服之類，不是這些外表現象，而是在需要一種對合理的或至少無害的言論和行為的容忍。雖然那些言論會有很多無聊和空洞的東西，但其中也會藏有一些光彩奪目的明珠。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

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

走上斜路，掉入泥坑的自然不會少，但在路上失足總比坐等不動好些。反正，近年來已很少聽到老天爺自天而降，幫人搞科技試驗的事了。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史爲「四長」

唐朝的一個禮部尚書鄭雅忠曾天真地問過當時的史學家劉知幾：「爲何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劉知幾就闡述了他自己的史學觀。現在看起來劉之「史爲三長」：才、學、識，雖然在唐朝可能有其新鮮意義，但對史學家必不可缺少的另一個特長「胆」未加闡明。

劉所講之「識」可理解爲「觀點」，這也可能會包括史學家的秉性特徵。不過「識」仍然是理智之屬性，和一個史學家的個性未必有關係。雖然劉知幾在七世紀修撰《史通》，總結了中國史學經驗，闡述了一個較有系統的史學觀，他對中國後來修編史書的枯燥無味，缺乏對史料的靈活運用必得負一些責任。中國的修史官吏無疑在史料的堆積和編輯方面做出了獨一無二的巨大貢獻。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或應該說中國的朝廷歷史——此指「正史」）的許

多詳盡資料在廿四史得到細心而富參考價值的羅列。不過只有一點令人感到惋惜：除了數本像太史公書和若干野史之外，中國浩瀚之史海不叫人淹死就叫人悶死。

中國歷史撰寫工作的可悲狀況並不是偶然的事情。歷史書編寫方法公式化，共性化，恰好跟中國傳統歷史觀和世界觀有聯繫。跟西方各國相反，中國本來是一個「往後看」的國度。民衆的希望不寄托在一個富於可能性和包含秘密的將來，而是在對遠古之盛世的模仿和比擬。賢能的君主不爲一個尚未出現的理想化社會而努力，而在言行各方面要盡「法先王」，侈望有一天黃金時代的堯舜式的社會會再現於人間。自上至下的整個社會如此迷醉於追求早已消逝（而可能從未存在的）理想化社會，史官們自然也會在過去尋找其模特兒。先是仿尚書的編年史修史模式，後來一個奇才，司馬遷以別開一面的寫史方法來豐富拘泥於崇拜先人的史官工作。但仿古、仿既定制度和既定作法彷彿了的官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生動活潑的史記當做一個千古不變的模式，把兩千年

以來的寫史工作基本上約束於一個死定的範圍之內。

模仿別人却為中國修史官缺「膽」的結果之一。照理講，編修正史的官吏想改個敍述歷史的方法甚為不易。光傳統的習慣勢力壓人壓得誰都喘不過氣來，除非是司馬相如之類的大人物；誰也甭想出什麼新花樣。不敢移動傳統的一根毫毛之外，史官們越來越怕惹出是非。時間一久，傳統愈固定，史官愈傾向於羅列史料，不僅「膽」無處表現，連個「識」也很難找到。

歐洲歷史家的寫史方法從最早就受到古希臘影響。希臘的兩名杰出歷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史書有很明顯的文學色彩。他們就把歷史看做一個有情節有人物的連續故事。英文裏現在用的「歷史」一詞（即history）本來是希臘文，其原意為「故事」（historia）。中文的「歷史」總有一個排列記載資料之意，歐洲許多國家用的從希臘文演變過來的historia一詞則有一個講故事的含意。兩種文化對歷史的基本重點就可以從此看到。當然在了解中歐史觀的區別同時，亦應該提出編撰歷史的對象在

兩種不同文化制度下有很大的不同。歐洲歷史家素來為讀者的興致或某一個政治目的而寫史，中國的修史官員却為規勸和教化後代而撰史。在歐洲的國王只怕受到上帝和神甫的譴責，不在乎史書上講他們不仁道。中國的君主什麼都不怕，只怕死後不留「遺芳」。現在歐美政治家只怕傳播媒介無孔不入的記者，中國的政治家遠勝古、外，不喜愛的歷史尚可任意改寫，這樣，中國數千年來的保守寫史法變得空前活躍。

西洋記同齊天大聖

某些日子，一位朋友從北京辦事回來，帶來一個使人哭笑不得的消息——孫悟空，中國小朋友所喜愛的齊天大聖被打倒了！嗚呼哀哉！人間的確無奇不有。連我這樣不易為中國任何驚心動魄的變動所驚嘆的人，聽到這個「噩耗」之後，也難免有點垂頭喪氣。

美猴王怎麼能給打倒呢？過幾天就要來一番闢謠吧？但我並無意造謠惑衆，而是想把孫老爺（好在雖然已到「點名」的地步，還不須名字上打叉）的遇難經過，告知美猴迷。

雖然孫悟空的「藝海浮沉記」談不到幾上幾落，但他自出世以來經常遇到逆境。看《西遊記》的人都知道，孫大聖如何同神道妖魔不斷搏鬥，這裏不必細表。

但他在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重逢五行山」的故事，沒有人寫下來。孫悟空跟中國的許多其他文學和藝術傳統人物，在「四人幫」覆滅後不久就從四害特製的五行山下解放出來重見天日。誰料到，孫悟空在一個現代化的較量之中失勢而敗陣。

行者的不幸並非陰謀，也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可能是現代化文藝發展的一個犧牲。孫大聖到底敗於何人？為什麼沒人為他叫屈營救？答案簡單而又令人寒心：孫大聖這個中國文藝想像力的結晶，中國對世界兒童文藝的一個重要貢獻，却被一個二流美國電視片集的一號人物打敗。美國這個電視節目叫做《大西洋底來的人》（The Man From Atlantic）。

據說《大西洋底來的人》，在中國幾個大城市電視台，每星期六晚上放一次。中國城市居民一週休息一天，一般都是星期天。星期六晚上就是他們的「黃金時間」，這節目一放，收視率之高會叫別國的電視系統忌妒得發狂。聽到孫大聖的羣衆被「番國超人」奪走後，我注意澳大利亞電視台節目，

發現了「大西洋先生」的節目最近在這裏也開始盤踞電台。有幾次我看了這個節目，以便了解中外大眾娛樂潮流之所趨。在小螢幕上所看到的只不過是裝了新瓶子的舊酒，跟美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超人型」電視節目並無多大差異。總之，有一位具有超越凡人能力或感官機能的正面人物，其所作所為可說是美國政治家鼓噪的「自由世界」的化身和體現。刻劃的英雄人物同有美式正義感和擁有許多現代化設備的人合伙，向罪惡和邪行進行鬥爭。每週放映半小時到一小時，英雄人物（過去都是男人，七十年代末，因婦解思潮滲透社會意識形態，以婦女為英雄戰士的節目亦出籠了），無往不勝，經過槍林彈雨和商業廣告的干擾，走向勝利的結局。

中國無人不唾棄文革期間文藝作品的公式化，無人不咒罵樣板文藝枯燥的藝術生活。不過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是，為了給民眾灌輸科學思想因素，引人走上「四化」道路，却有人抬出美國的半生不熟的庸俗科技八股節目，在全國大城

市播放。要是激發人們的科學積極性依靠如此移花接木，恐未必是上策。

中國的很多大人和兒童，迷上了在水裏不用呼吸、非常善良的大西洋底來的超人。孫悟空大概會從五行山下，伸伸頭擠擠火眼金睛，等到有朝一日，洋洋八股被中國觀眾看破了，再騰雲駕霧獲得昭雪吧。

我自己並不欣賞美國那些廉價出售的、演員好但無演技、內容新而不鮮的節目。這可能是跟我幼小時看膩了這種節目有關係。但要從社會效果的角度，評論美國這部電視片集，很可能要賞它一個百花獎。原因麼？是因為北京、上海等地每逢星期六晚上人人都屏息圍觀《大西洋底來的人》。結果，幾個大都市的犯罪率忽見下降，證明小偷流氓們也都想趕時麾，看看他們在美國的對手如何同主人翁較量。可能看了節目裏五光十色的道具，他們的貪心會劇增。有得有失，只怕沒人認真權衡一下，所失是否甚於所得？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

極左派何止一人？

林江集團的審訊已進行了數週。江青的最後辯護比原來的估計更花時間，更耗法官和陪審員們的精力。這可說是整個審判的壓台戲，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謝幕獨白。

審判開始舉行的時候，我還在日本學習。雖每天看報紙，但不像在香港較快地看到法庭上的情形，我到香港之前，沒看到轉播的電視紀錄片。前幾天才終於能夠觀賞到法官審江青的鏡頭。

雖然我本身沒有遭到「文革」的直接迫害，我在中國的大部分朋友和同學却都受到了，但程度不同。我在中國留學期間，因為搞文學專業，不得不同江青的文藝理論打交道。過去的不可侵犯的權威，現在作為刑事犯來審判，引起我無限感慨。

審判的是「十惡」，繼之還準備在地方審訊其他罪犯。自處理刑事罪犯看來，極左思潮恐怕不會因為處死幾個人而杜絕。「文化大革命」初期，全中國千千萬萬的人熱情參加，一直到現在還有人雖對林江分子無好感，對於「大躍進」至「四人幫」被捕二十年的一些「左」的政策和理論，則並未全盤否定。

中國是否還有極左派？我想有。不但在幹部當中，而且在羣衆當中，都有二十年廣泛流傳的這種思想殘餘。

此外，還有一種人很值得注意。他們大多數是那些沒有後門可走，無關係可拉，海外沒親屬，教育水平不高，有強烈物質佔有慾但沒有很好的收入的

人。這些人看見現在的中國社會飛黃騰達的人眼紅，想在新的自由風氣裏自己撈一把，但撈不到，或撈得不多。其中有一些想盡非法手段發財，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比較老實，只是埋頭活下去。那些臨時工、待業青年和低工資的人，現在不惹人注意，但若在新的體制下建樹不大，將來的動靜就很值得注意。

我個人想，中國暫時不可能出現極左派復辟。但我覺得在中國尚有極左思潮，而且不會很快消除。法律保障，制度的民主化，和羣衆知情權的擴大，才能防止極左派和極右派的抬頭。極左派與極右派的危害相同。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口號與廣告

七月第一次聽到「信任危機」這個詞。是不是一個有歷史性的詞組，或是卡特先生獨創精神的另一表現？待專家們研究。不管它的來歷如何，卡特現在用這種精神恫嚇來掩飾他自己政治地位的真正危機，還是頗耐人尋味的。

我素來對心理學是個外行，對政治家和政治心理學的知識更為微不足道。不過，我覺得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是：每逢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不安寧的時候，口號和種種「精神武器」就會大量的出現。遠的暫時不談，光從我前幾周回到澳洲以來，發現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也在播放政府的一些口號。

自我的童年回憶起，恐怕很難想出什麼時候，澳洲社會上出現過如今這麼多口號。大概就在那一次美國總統約翰遜訪澳時，當時的總理提出一個「All the way with LBJ」（約翰遜到哪裏，我們要跟着他到那裏。）LBJ是約翰遜的

簡稱），此外，我們政治生活就很少有官方提出的口號。

這次回澳洲的頭一個晚上，累得只想看一下電視有些什麼新節目。開了沒多久，節目讓位給一些無聊透頂的商業廣告（比如有一個是有一個人踩高蹺走路，說他到哪兒都用某牌衛生紙，衛生紙又是如何如何的好之類，真叫人莫名其妙）。但最後一個「廣告」並沒有介紹某一家的新物品，而是一個公共服務性的廣告。其內容極其簡單，屏幕出現了一個澳洲地圖，裏面裝滿了人。這些人代表全國各種各樣的行業，他們却在喊我們每個國民要作出努力為澳洲而工作云云。漫畫式的地圖及人物畫得很粗糙，用的旁白也非常不精采。這種玩意的作用如何，待考。不過它確是澳洲傳播媒介的一大奇事。

如果我們富裕得可怕的小國電視上也有這種打「強心針」式的宣傳品出現，那麼，在確已面對着嚴重精神危機的美國，恐怕這種廣告、口號和宣傳要更多。資本主義社會碰上危機，要大提特提口號和政治廣告乃是事實。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口號，亦是跟危機和不安寧的生活有相當大的關係。

係。

記得我住在中国的三年裏，政治口號仍然特別多。動輒要來個：「為……而奮鬥！」或一個「保衛某某東西。」報紙和廣播幾乎是一連串的政治口號。

現在回憶起來，可能是當時的一些領導大人感到交椅坐得不牢，就用又長又嚇人的政治口號來取代人民的大腦思維，來一個代替理智的「干擾」。中國的口號現在比過去要少得多了。中國各地亦在拆除大型的口號和語錄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商業性廣告正在取代政治口號。其實少點冗長而沒人注意的空洞政治口號和「語錄」是件好事，但推廣一般老百姓買不到的商品廣告多起來，恐怕也不見得是個進步。在澳洲，要政治宣傳收效，不應該也不可能用些簡單而陳舊的方式。在中國，搞商業廣告也不能不想到廣告在中國社會裏會起什麼作用。毫無取捨地搞一通新的「拿來（而拿不到！）主義」，不怎麼好。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代溝的膨脹

不知是怎麼回事，可能是核子時代的一個特徵吧？近數年來到處見到許多猛烈膨脹的東西。原先只知道許多國家有通貨膨脹，但上次到北京去，則發現自從理髮店紛紛恢復女髮冷燙熱燙以來，不少北京的賢妻良母都爭先恐後地把「膨脹」的秀髮加於她們自己頭上。

前些日子，筆者打道回澳洲，也有一個相當驚人的發現。以前（此處指六十年代後期及七十年代初）把西方社會搞得四分五裂、比糟糕還要糟糕的「代溝」（*generation gap*），已經膨脹和擴散得人人都認不出它的新模樣來了。

其實，青年一代的神聖代溝，並未被這膨脹擠垮。不過「代」之突增和「溝」之擴大，却把原來的父母輩與子女輩之間的隔閡，弄到六親不認，代溝輩出。這個怪現狀一方面叫人摸不着頭腦，嘆息人心如何之不古；另一方面却

也能夠證實：下一代是多麼聰明靈俐，並具有獨創精神。我以為，代溝膨脹的根源，在於「輩代主義」的出現。

「輩代主義」此何物也？前此我亦茫然。但在澳洲與朋友交談中，發現這個新詞不時出現。據說，它是跟着西方社會流行的各種各樣「解放」運動，如婦女解放，同性戀愛者解放，資本家解放等而出來的。社會上的大大小小團體和個人都在求「解放」，由於年歲相同相近，而受到歧視的人於是也有了一个念頭：為何不來個自我「解放」，以反對「輩代主義」？

簡單地講，受到「輩代主義」歧視的有兩大類：一為年幼者，一為年老者。不過，這歧視是另眼相看之意，不可硬說是含有惡意。

光就兒童而論，他們的確經常受到長輩的歧視。兒童豈不可悲也乎！因為他們沒有向政府請願的權利（但去年在香港好像有過這麼一件事——可視為「兒童解放運動」排山倒海之勢的壓力下，「輩代主義」開始受到衝擊）；沒有議會代表；亦不准組織工會（在澳洲上學讀書不可算為「工」）。所以他們

受老師、父母、街上管閒事者之欺凌，也無法抵抗。現在小朋友們尚未出現一個有組織的運動，估計是缺乏領導；但一有領導，不到幾年就會隨着他們年歲之增長，自然而然地變成「輩代運動」的鬥爭對象！不過小人們（此處為「小人書」之「小人」，決非「小人」，「君子」之「小人」，以表示對小朋友們之尊重），還是提高了認識，分清了敵人，向長輩提出了正義要求。

嗚呼！中國俗語曰：「好事多磨」。小人們的「好事」要是磨得太久，他們一個個長大，結婚，生孩子，對下一代又開始施其淫威。下一代則只好為他們自己的「解放」而掙扎。自兒童時代到老年時代幾十年裏，很少有人為受到「輩代主義」歧視的小人和老人鳴不平。但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總有兩頭受到「輩代主義」歧視，這是很可悲的。只希望這兩頭之間的人認識到，年富力強之時，少欺凌老幼才是緩和「輩代主義」之道。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

1984+6=1990

我在澳大利亞上高中的時候，英文班每年要考一些必讀書。除了必不可少的幾個莎士比亞話劇和十八世紀的詩之外，教育部總會選若干本近代和當代名著。高年級的學生就得看薩特爾或卡繆的幾本存在主義作品，低年級的學生就要看文選或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作品。

我上五年級（即會考前一年）時，曾專門把奧威爾的兩本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1946）】和《一九八四年》【“1984”（1949）】讀了一陣子。我們當時思想較單純而未定型，所以奧威爾的這兩本書在我同學當中有很大的影響。用心理學家的語言來說，這兩本書在我們心靈上形成了幾種難以抹去的形象，亦可說是典型。《一九八四年》裏神通廣大，無孔不入的「老大哥」（專制制度的別稱），現在已成為一個常用於描述利用現代化傳播

媒介和技術搞專制性統治的人或制度。一九八四這個普通的數字，在西方一般人心目中染上了一層十分恐怖的意思。對許多人說來，「一九八四年」則是「文明世界」的末日，一個新的法西斯時代開端的象徵和代號。

奧威爾作品之通俗，文筆之流暢，已經使他在近代英國文學史上得到一個不可否認的地位。他的幾部小說對生長在原子時代的人具有巨大的啓迪力，給許多作家以鼓勵和寫作動機。現在澳洲電視二台還在放映一個根據奧威爾《一九八四年》改編的電視片集。這個節目叫做《一九九〇年》，我擅自稱之為「一九八四加六」或1984+6，以說明奧威爾先生對製作這種節目在思想及藝術上的影響。

《一九九〇年》是在英國攝製的。這節目力圖描繪英國在極右的保守官僚主義統治下的社會實質。主角是一個有強烈叛逆精神的新聞記者。他利用他

一家還沒有被查封的獨立日報的記者身份，向黑暗、卡夫卡式的政權統治，進行揭露和鞭撻。他主要的敵手是「公眾控制部」的幾位負責人。雖然他許多行

爲和社會活動被公衆控制部竊知，但是，因爲官僚階層的統治之手尚未伸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那記者還能夠明爭暗鬥地生存下去。

這個電視劇和奧威爾的書一樣，不用多餘的藝術手段或誇張手法來唾衆取寵。淺淡的顏色，簡練的筆調和謐靜到恐怖地步的環境，是《一九九〇年》和《一九八四年》成功的要素。虛誇的文風和華麗的佈景，只會使這種思想主題獲得暫時的讚許，而不會在幾代觀眾或讀者當中引起任何有意義的共鳴。《一九九〇年》這個節目雖可能只有一年半載的壽命，但對早已忘記《一九八四年》深刻內容的讀者，一定會起一個「催促回憶劑」的作用。說不定會有一些人，去尋出久藏的中學課本來翻閱一番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

澳洲的一家「工人工廠」

澳大利亞的電視一般來講，沒有很多引起我注意的節目。但每逢時事節目，我一定要對準「傻子箱」，看它一通。昨天晚上在看二台（即政府台）時事節目《四方》（Four Corners）後，就覺得電視的確有時會放映一些有意義的東西。例如，維多利亞州墨爾本市一家由工人自治的工廠。

「現代姑娘」爐灶製造廠在近八年三次遇到廠主高價賣廠。每次賣廠，工人的積極性就橫遭破壞，甚至有不少工人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生怕解僱。年初廠主準備再次高價賣廠時，幾十個管理人員以及普通技術工人就合夥想辦法，徹底解決他們的心理危機和工作危機。經過全廠三百個工人與工會代表和其他管理人員的商討，工人和管理人員決定合股買廠。舊廠的一百五十個工人，得到了州保險公司的協助，把工廠買下來，接管全廠的工作。這是澳洲第一

一個大型工人合作工廠。

這「工人工廠」營業半載後，原來的一百五十個股東已增加到二百三十多個工人。在這個爐灶工廠多年的工人，都為有機會投資成為工廠的主人而高興不已。他（她）們覺得，投資買廠比當勞動力，當受廠方任意使喚、隨時有解僱可能的工人好得多。「工人工廠」的所有股東都是該廠的工人。哪個工人離職，就必須把股份賣給工廠。這樣做就可避免外來控制。

「工人工廠」的管理由一個管理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成員是原先的職員以及車間工人的代表。工廠的日常管理由四個工人管理委員會負責，包括質量、生產、安全和經濟管理。工廠的工人實由世界各國後裔（如意大利、希臘、南斯拉夫、東歐各國、英國等）組成。一般股東有一百至三百澳元的股票。他們估計年底就可還清貸款，從明年開始就可以給工人分紅。

爐灶工廠被工人接管以來，一般工人對工廠和廠裏生產的態度有極明顯的變化。以前對生產和管理漠不關心的工人，忽然間向管理委員會和車間負責人

熱情地提出技術革新、改進生產的種種建議，全廠精神面貌為之一新。該廠產品包裝箱上註有：「為澳大利亞，只做一次但要做得好。」

《四方》記者訪問「工人工廠」管理委員會時，提到澳洲工業停頓狀況，這時就有一個委員說：「現在政府在搞一個『為澳大利亞出一把勁』宣傳運動。其實澳洲是有希望的，不過喊口號不是辦法。我們的工人合作廠才是澳洲工業行之有效的最有希望的辦法。」那記者在訪問結束時，自己加評語說：「這個極其簡單而合乎邏輯的試驗，給整個澳大利亞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工業經驗。」當國有化在許多國家遭到困難的今天，工人合作社式的工廠管理，的確有其新鮮而可取的地方。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形象與民意

本來形象有兩種不同的意思。一曰：形狀相貌，指一件事物或一個人的外表而言。二曰：文學藝術作品，根據對現實生活不同現象的選擇而構成的具體的畫面或人物。當今世界，的確無奇不有——形狀相貌竟和文藝形象融為一體。這是現代化科技的非凡創舉。

近代化傳播媒介工具中，電視機就是把人的相貌及其性格通過十幾寸寬與長的屏幕，傳送到每個擁有電視機的家庭裏的。不管是多麼受到人們尊重或愛戴的人，一上電視，他（她）就不僅是一個人，而且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電視演員。電視把它播送的所有現象、事件和人物，變成一家人的娛樂。光是一個新聞節目，就可概括人的七情；在幾十分鐘或幾分鐘（若您喜歡轉換頻道）之內，電視觀眾就可以把幾天或幾周的感情起伏（不只喜怒哀樂），集中的經驗

一番。

收看電視節目的觀眾，並不是唯一得到電視奇特效果的人。在電視屏幕上出現的人，亦會感受到「傻箱子」（The idiot box，澳洲俗語）的電子改造。最常見的後一種人即所謂「電視人物」（TV Personalities）。香港各電視台的此種人特多。比如「無線」台的夜間節目《歡樂今宵》裏的「電視人物」，每晚就充斥於許多人的客廳。很多「電視人物」上電視以前跟普通老百姓無啥兩樣，但一當面對電視攝影機的冷酷獨眼龍，他們非改頭換面不成。結果，平常需要一周或幾周才能消耗掉的精力，在數十分鐘的壓縮表演裏就會用盡。當然常上電視的人很快就變成擰得過緊的彈簧一樣，緊張得一天到晚想活蹦亂跳。顯然，這些人是「秋後的蚂蚱——蹦不了幾天」。

常上電視把人變成奇形怪狀，並不是什麼了不起或想不到的事。反正是個職業病罷了，不足為奇。使人詫異的是政治人物，一上電視同樣也會受到「傻箱子」的無情玩弄。玩弄一下那些刻板自滿的老骨頭或大人物，本來無妨，但許多自視甚高的政治家老爺始終沒有想過電視之可利用而又不可利用的道理。

舉例來說明。五十年代末的美國尼克松和約翰·肯尼迪競選總統時，在電視上短兵相接過幾次。兩人在電視上就辯論各自的政見和政策。當時爭辯的內容無疑十分重要，不過到現在已經沒人提它了。談得多的反而是尼克松和肯尼迪的「電視形象」。英俊潔淨的未來總統肯尼迪，給人一種可靠、穩重而可信的印象。尼克松先生却受大自然和生物規律的戲弄——他上電視以前沒把鬍茬刮乾淨，在屏幕上顯得與黑手黨頭頭不分上下。「狡黠的狄克」（Tricky Dicky）數次蓬頭垢面的「五點鐘影子」（指下午鬍茬多狀）在電視上出現，相形之下，在形象方面就輸給肯尼迪。

到了二十年後的今天，各國政治家認識到他們「電視形象」的重要性了。像敝國的總理弗雷澤老爺，他平常給人一個高傲自滿、中學老校長似的印象。他在電視上講演時，這種不太高明的形象就傳得更真實更可厭。結果弗雷澤找遍了全國才找到一個「電視形象顧問」。依我看，那位拿高薪的「顧問」可能

只是個化裝師。半年時光和數次電視講演過去之後，弗先生還是顯得跟復活節島的巨大石頭頭部雕塑一樣的嚴肅無情。

中國的領導人因為電視不普及，多年來倖免於電視對其形象的「渲染」。但以報紙和剪輯美化得厲害為典型的宣傳時代，在電視機普及後將告結束。中國現在的政治家再也不是躲在大屏障之後了。他們在電視新聞節目有聲有色的出現。人民羣衆終於有機會看到並聽到他們領導人的形象和聲音，現在，也許尚待美國記者進行一次民意測驗，問一下：「你們滿意不滿意」？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

電視警察的禍害

電視是一種具有奇特影響力的傳播媒介，影響深遠，在各國社會產生許多令人驚奇的作用。

本來一個傳播工具的影響範圍，只應限於傳播消息和各種娛樂節目，但在傳播媒介的歷史上，四四方方的電視機却開天闢地，拉開了新時代序幕。在現在「電視時代」，電視——這個現代化的傳播媒介，已經成為社會的基本動力之一。

我這樣說，有人可能莫名其妙，或一笑置之，但我確實是「言之有物」的。一個「開機皆是」的例子就是電視警察。西方各國，日本、香港和亞洲其他地區的電視台，在高收視率的鼓勵下，不斷播放以警察為主角的種種電視劇。主角不僅是偵探、警察或便衣特警，亦有普通的民警和交通警，甚至有以水警為

就澳大利亞的警察而言，近幾年來《夏威夷五零》（港譯《警網雄風》）之類的美國警察節目，看得警察先生們羨慕不已，有如望梅止渴，老想着自己非得像電視屏幕上無案不破的偵探警察那樣不可。結果是每個州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警官，就在年度經濟預算方案大動一番干戈，買了各種新式武器（催淚彈，硬塑料彈，直升飛機，竊聽器等等），來大顯其手下之威風，其實和美國電視警察英雄一樣，都是色厲內荏。美國警察劇對澳警裝備之改進，是確收奇效的。但只有一點令人嘆息不已，那就是：我們黑社會還沒有警察那麼機智敏捷，還需要向電視上的壞蛋看齊，好把整個社會弄得烏煙瘴氣，這樣，才可使我們現實生活當中的警察英雄真有其用武之地。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國攝影師所見的澳洲農民

對居住在北半球的人來講，像澳大利亞的國家是有點怪。比如說，中國人在寒冬過元旦和春節的時候，澳洲人則是蜂湧到沿海各地的沙灘，去游泳曬太陽。歐美的「白色聖誕節」之時（即雪花飄飄的冬天天氣），在澳大利亞恰好相反，是個熱得非到海水裏去猛泡一天半日不可的天氣。我們的思想和習慣，跟澳洲處於南半球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

在澳大利亞這個「倒過來的國家」，愈往北，天氣愈熱。南方不像中國的廣東、廣西，而是像山東、河南或遼東半島。我們這裏的北方是熱帶氣候，跟全國人口最集中的東南海岸地區完全不同。

中國「新影」（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製組在東南大城市悉尼逗留了一個月之後，就到澳洲的東北——北昆士蘭州（North Queensland）和凱恩斯

市（Cairns）南邊的甘蔗地帶。

「人格化」的表現手法

攝影組的導演決定通過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來反映甘蔗種植過程。這種「人格化」的表現手法，在中國的紀錄片可謂罕見。幾十年來死板的政治宣傳紀錄片，跟中國其他宣傳品和教育品一樣，深受公式化和臉譜化影響。在不斷「突出」的口號喧囂聲中，人格以及人們的特點，被毫無個性的「一般化」所取代。現在試用一個家庭及其成員的日常活動，來顯示一個社會的某一個地區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這對中國觀眾來講，一定會有較大的啟發作用。

「新影」攝製組就在凱恩斯市附近的巴賓達地區，找到了一個務農的家庭。這裏是全澳洲降雨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一個重要的甘蔗種植地帶。當地所產的甘蔗，由巴賓達農夫合作軋糖廠提煉成粗糖，運往附近海岸散裝碼頭裝船，再轉往大城市的糖加工廠或出口。雖然澳大利亞並非世界上較大的產糖國，不過其出口粗糖的重量，居產糖國第三位。因此，甘蔗種植和粗糖生產在

澳大利亞外貿方面，就佔較顯著的重要地位。

家庭成員的工作與愛好

「新影」攝製組所拍的農家，跟前幾周拍的工人家庭大不相同。光就成員而言，農夫家庭除了四十幾歲的夫妻二人，還有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若要大大兒子的妻子，二兒子的未婚妻和女兒的男朋友都算上的話，這一家就膨脹到十個成員。什麼公公、叔叔、姪兒、姪女之類，還沒有算進去。比起只有四個成員的城市家庭，這農家顯得很龐大。不僅人數多，而且家庭成員的工作和愛好亦極為豐富多彩。農夫妻子除了做許多家務，還參加「鄉村婦女協會」（Country Women's Association），她一空閒，就愛用毛線編織些小娃娃、狗和其他動物。她這種副業主要是個愛好，所以有時候她也把所織的東西送給朋友。

模特兒・木工・焊工

十八歲的女兒，在一個賣布疋和服裝的舊式百貨公司做工。她自己喜愛衣

主角的。目前的電視節目，確實是「無警不有」。就有人意識到現代化電視警察劇起源於美國。五十年代電視開始普及時，就有人意識到現代化

電視警察劇，一定會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西部片一樣受到觀眾歡迎。倘若細看警察劇，不難發現其人物性格、暴力程度及情節的公式化，都跟西部片有一脈相承之處。有人甚至說，警察劇裏的人，不過是穿警察制服的美國牛仔。當警察劇，不難發現其人物性格、暴力程度及情節的公式化，都跟西部片有一脈

相承之處。有人甚至說，警察劇裏的人，不過是穿警察制服的壞人也就不限於紅印第安人了。

於紅印第安人了。而且，這個不十分遙遠的鼻祖的血液，還在美國電視（和電影）上的無數人物

出現牛仔和印第安人的西部片，是現在美國大部分暴力電視節目的鼻祖。軀體內循環着。不明這個真象的警察劇愛好者，往往視若無睹，而看不到美國

現在電視劇的這個要素，和它影響社會現實的秘密。而且，這個不十分遙遠的鼻祖的血液，還在美國電視（和電影）上的無數人物

現在電視劇的這個要素，和它影響社會現實的秘密。而且，這個不十分遙遠的鼻祖的血液，還在美國電視（和電影）上的無數人物

「美國之夢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在出口電影、連環畫及電視節目的不斷

「美國之夢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在出口電影、連環畫及電視節目的不斷

「美國之夢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在出口電影、連環畫及電視節目的不斷

渲染下，「美國之夢想」的要員亦成爲美國文化擴張和懾服別國觀眾的理想化形象。歐洲各國如此，亞洲許多地區亦不例外。恐怕連香港近十年來的「功夫

形象。歐洲各國如此，亞洲許多地區亦不例外。恐怕連香港近十年來的「功夫」復甦，與美國牛仔英雄在國外泛濫也大有關係。
牛仔英雄思想之單一；處理問題的簡單化——一般是以手槍走遍天下；和個人生活的單薄（此種形象塑造可跟「四人幫」的「三突出」媲美，應該叫做「三單主義」），是現在美國電影和電視英雄的基本特徵。既然如此，牛仔英雄就不僅是警察劇的模特兒，亦是許多國家傳播媒介宣揚的道德規範和性格品質的根基。

收看電視節目人數衆多這個事實，已把電視抬到最有效的輿論工具的交椅上去了。穿警裝的牛仔英雄們因此就變成相當有影響力而受到觀眾崇拜的必視人物」。如若這種人物的影響和意義只限於消遣性，那我原無如此囉嗦的必要。但是，電視上手持現代化武器而只有十九世紀美國西部的簡單甚至遲鈍腦袋的「牛仔警察」，却在社會上具有直接而且可怕的教唆作用。

着，有機會就參加服裝展覽當模特兒。

已婚的二十二歲大兒子，現在有自己的房子。他在附近的大甘蔗場工作，他太太就在小市鎮的一家銀行做事。到種甘蔗的時候，老大和老二都回家，幫助父親開種植機，種甘蔗。二十歲的二兒子是個木匠。他和一個朋友給一個建築公司做房頂，做室內木工。老二每天一下班，就跑到他自己買的一塊地去，幫助他僱傭的建築工人，蓋他自己的房子。他和做藥房服務員的未婚妻明年二月就要結婚。老二的父親原希望幫助他們買一個農場，但因近幾年的地產價格膨脹，只好幫他們向銀行貸款蓋房子。十五歲的老三在巴賓達軋糖廠做徒工，主要做焊接。可能是鄉下環境對人有益，三兒子雖然年紀輕輕，個兒長得却像個十八九歲的青年。

幾百隻鳥和孔雀

最小的兒子只有十二歲。白天騎自行車上學，下午回家以後就餵鳥。鄉間的小孩比較孤寂，所以往往有些與城市青少年不同的愛好。這小兒子喜歡各種

鳥類，幾個大鳥舍裏養了幾百隻鳥。鷄籠旁邊，還養幾隻孔雀，這給他養鳥活動增添不少色彩和情趣，那十二歲小孩，也會開他父親的拖拉機，在田裏幫助幹活。雖然他出去玩，可是看電影與朋友嬉鬧的機會，沒有城市孩子那麼多。但他生活裏有許多城市孩子所羨慕的東西。

雖然澳大利亞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東南澳大利亞的幾個大城市裏，農業和農產品仍然佔全國經濟和出口產品的重要位置。從澳大利亞東北的一個甘蔗場家庭，就可以看到鄉村人民生活和生產的縮影。對中國的觀眾來講，反映這一家農民，不但會加深他們對澳洲的認識，還可能引起他們想得更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從「明華」輪談起

香港的電視台愛搞什麼攻勢。每逢有人懷疑某台節目的收視率降低或比敵對台為差時，就得全台動員起來，搞個什麼攻勢或者什麼出擊之類的大規模的宣傳，來壯壯自己的聲勢。總之是花樣多多，但目的則一，在於多些爭取觀眾，提高節目的收視率。

中國本來也歡喜搞各種各樣的攻勢。然而搞得人們暈頭轉向、肚餓腸飢的比和風細雨、心情愉快的要多。現在，聲勢駭人的戰鬥攻勢已為經濟和生產的攻勢所替代，此舉無疑將會有較大的益處。新經濟攻勢之猛烈，連在遙遠的海外也時時受到波及。舉個具體的例子，香港至汕頭、廈門或者上海，都有新開航的中國客輪「鼎湖」、「鼓浪嶼」和「上海」號航行，但讀者中可能未必知道乘坐中國客輪遠遊南太平洋的吧！現在，有一艘名叫「明華」號的客輪，正

航行在南太平洋上。中國發展旅遊事業，要向蘇聯客輪爭奪太平洋地區的生意，可說是中國廣開大門、奮發圖強攻勢的又一件新事。

我因為近日上課緊張，沒法跟幾位抱着好奇心的中國朋友，到悉尼港去探望「明華」號首航來澳洲的情景。但從報紙上的文章獲悉：「明華」號這次首航，搞得相當熱鬧。澳大利亞的一個名為「亞細亞太平洋客輪旅遊」的公司，主動向中國提出合作要求，來搞南太平洋地區的旅遊。該公司幸而逢上中國大搞旅遊事業之際，獲得批准，自一九八〇年一月起，進行舉辦中國客輪第一次在太平洋航線的旅遊。

光就「明華」號的外表而言，據說是綠色的船身，白皎皎的船艙，鮮艷橘子色的救生船和紅色帶黃條紋的煙囪，似乎非把你的注意力集中不可。船上的設備挺齊全，但中國的工作人員却未能理解到一些西方遊客（大部分乘客都是澳洲人）的嗜好。比方澳大利亞人大多愛啤酒如命，很快就把船上的冰箱弄得空無一物。「明華」在悉尼停泊的幾天，首先要加裝冰箱，保證遠洋航程上

的「酒源」。

在澳中兩方面發出介紹「明華」號的宣傳材料中，有些提法和誘餌曾令遊客心中產生一些侈望。比方在介紹材料中就聲稱船上可以吃到中國傳統的、美味的京菜、粵菜、瓊菜和川菜。結果呢，除了半冷不熱的咕嚕肉（即已經歐化了中餐）之外，什麼傳統美味之類的中國飯菜却沒法吃得到。中國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光在悉尼一個城市，就有百多家中國飯館，你要是想蒙混過關，給人家炒個不三不四的中國菜，我勸你最好還是別在澳洲人的餐桌上展示手藝了。其實，遊客對於菜式和飲品的怨言跟一般外國人在中國旅行時一樣，要的是熱菜冷飲，不要冷菜熱飲。如果這個關係一經顛倒，便會令外賓老爺們嘮叨不已的。

澳大利亞遊船公司的負責人說，遊客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滿是這種旅遊的正常情態。凡是正確的意見，要有時間才可以解決。他認為，中國第一次搞這種規模的遠洋旅遊，成績已經不少。他沒提到中國船上工作人員的一些不大熟

悉的地方。例如，最易使中國工作人員和遊客之間發生誤會的，是澳大利亞遊客不跟孩子們一同吃飯的習慣。中國人酷愛晚輩，很難理解西方人珍惜成年人自由的思想。有一位遊客說：「我來旅行本是爲了擺脫煩死人的孩子，不是爲了老跟着他們在一起的。」

最後船方不得已，另闢了一個兒童餐廳，好讓孩子們和他們的父母在分開的餐廳裏安靜地進餐。

中國爲亞洲的國家，應當大力發展太平洋地區的旅遊事業，也更應佔領這個不斷增大的亞洲旅客市場。光由蘇聯的客輪去獨吞這個市場，往後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一九八〇年二月六日）

旅遊雜感

好不容易才等到學校休假。前幾天我和幾個朋友駕車到澳大利亞東北部的大都市——布里斯班，去參加一個全國亞洲學會議。本來我對那種擠滿一屋人、聽幾個玄奧的學術報告的會議不感興趣，但因在會場有機會看到一些老朋友，還是去「光臨」了。

在會場磨嘴皮和放大砲之際，我們幾個不速之客就想趁着身在大都市的良機，大飽眼福。不料這北國大城市除了一條河蜿蜒流經市中心外，並無多少名勝。過去我到過布里斯班以北的海岸，知道那裏甚美，但這次因時間關係，只好把自己關在市內，以高雅自居。

我們有一天下午發現，這裏電影院正在放《星球大戰》第二集《帝國反擊戰》。在首都坎培拉總得等大城市居民看過了才能看到新的外國片子。除了支

付高油價等等之外，我實在不知道住在首都優越在甚麼地方。反正有機會趕一下八〇年代時髦，再加另外一個原因，我們還是跑進電影院。

其實在看《帝國反擊戰》前，我早已嘗到了味道。這不是指大量的宣傳廣告和評論文章，亦不是說朋友的口碑。我所說的味道比這些還要具體、真實得多。在布里斯班舉行亞洲學會議期間，我住在一個老同學家裏。他有一個十幾歲的小男孩，活躍得要命，喜歡摔跤、擊木劍之類。

他知道南方的叔叔們要來住幾天，就自備一個新玩具，同伙伴廝殺。玩具是模擬《星球大戰》和《帝國反擊戰》裏的一柄「光劍」。而光劍不過是一個裝霓虹燈管的玻璃管，刺殺起來頗似激光。

天天看孩子們的光劍，只覺恍恍惚惚，這就逼得我們去影院見識光劍鼻祖。《帝國反擊戰》無疑是繼魯卡士第一部「爆炸性」巨片《星球大戰》又一個里程碑。這一點，我同影評人並無爭議。不過面對手持光劍的擊劍士相互廝殺鏡頭，我心裏總浮現無數西部片、戰爭片和電視影片的類似場面。無論什麼

樣的奇裝異服、五花八門的面具，到頭來還是離不開公式化的勇殺頑敵，血流成河……。

但我本是電子時代的嬰兒，所以編導的臆造再離奇，我也不覺得什麼新鮮。電影和電視片的題材，近來基本上沒有多大突破。製片人的精力現在主要放在表現手法和種種特技上。結果，麻木的觀眾觀看千篇一律的「新」節目時，真正能夠引起注意或喝彩的，只是那些新穎的細節而已。這種題材的貧乏，對影業公司大賺其錢當然無妨，但對老而又老的那幾種主題的潛移默化作用，頗有促進之效。

愛、性、戰爭，這三種永恆題材裏的戰爭最值得研討。愛和性不管「藝術家」們怎樣擺弄，至多惹出一些無端的是非，但還不致於太危險。戰爭就不同。原本和睦可愛的孩子們，戰鬥片看多了就會暴躁起來，上述的那位揮舞塑料光劍的小先生可為一例。小孩偶爾看一部「超人」，想入非非，危害尚不太大，一羣小孩手持光劍，玩弄塑料子彈的手槍，在街頭或公園裏互相鬥毆，結果

局也不過一點皮肉之傷。但浸淫於「戰鬥文藝」的青少年，一旦有機會在社會上持刀舉槍，那就不得了。

中國文化革命大量流血事件，除了「誓死保衛」思想作祟外，我懷疑中國解放後大量反映抗日戰爭和其他戰爭的文藝作品，是否也有其始料所不及的影響？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九日)

筆名及文責不負

筆名這玩意，從我一開始接觸中文就覺得是個較頭痛的東西。尤其對喜愛中國近代文學的外國人，筆名簡直是避免不了的頭等麻煩事。好好的文學史研究，由於筆名衆多就變成考古學一般。好在時間一長，名作家用的筆名差不多都已被「考證」出來了。光一個魯迅（此亦係筆名，原名周樹人！）就用了幾十個不同的筆名。一直到現在，中國學術刊物上還會報道魯迅化名寫的作品在某地被發現，而予以刊登。

在民國年間，某些作家用筆名確有必要。政治壓力經常把一些敢於露鋒芒的人扼殺。恐怕筆名的出現，跟清朝雍正和乾隆兩朝之大興文字獄及其餘緒有關。據說當時提出「異端邪說」的作者，不但自己有殺身之禍，連親屬一切有關人等，也逃不過朝廷的天羅地網。到了民國，因情形有類似之處，甚至變本

按理說，筆名現在大約沒有存在的必要。但在香港和中國內地報刊上的筆名恐怕是空前之多。有人說，用筆名較「雅」——認為自己的姓名庸俗者，可以筆名來「脫胎換骨」求得新生。也有人說，用筆名就可「文責不負」。雖然大部份人用筆名已成爲一種習慣，並無惡意，但也有人專門用不同的筆名來罵別人，而不讓對方與讀者知道作者是誰。其實這也無妨，但還是少用筆名好些。另一方面，若都用真姓真名的話，讀者可能會發現他們常看的報紙或雜誌，大部份文章原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所以還是用筆名之「虛」來掩蓋「一言堂」之「實」爲好。我看這也有些道理。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藥西用

在中國人的社會裏經常會聽到人講：「上火了，身體不舒服」，或「這個東西很熱氣，吃完了還得吃點涼的。」之類的話。這些話本身沒什麼奇怪，但令我費解的是有人問我：「你相信【上火】和【熱氣】嗎？」真是問得莫名其妙！

我想，中醫裏的有關「生熱」和「生火」的理論，並非一個先有人相信才存在的東西，或曰先驗的東西，而是幾千年來中醫醫療實踐所證明存在的。再說，中醫不是個可信奉或可不信奉的宗教，而是一門科學。我如此一本正經，是因為西醫本來也有跟中醫甚為相似的「生火」理論。可惜因為社會之變遷和所謂「現代化」的醫學之發展，這類理論已被斥為迷信而消失了。

古希臘和後來的羅馬帝國的醫學都非常重視軀體之四氣：即火、水、木、

金（有幾派醫學理論家把氣或 *aether* 算做第五氣），在當時的醫學理論看來，四氣（或五氣）失掉平衡，就產生人類的各種疾病。使身體之四氣失常者，有外因，亦有內因，甚至亦有內外交錯導致疾病的情況。這跟中醫的「虛實」說，有很顯著的共同點。調攝小病和治療大病就要投以藥物，活動和「精神治療」。這就是「精神、肉體和外在物體」(*spirit, body and matter*) 相互調理的醫療方法。後來這套理論和治療方法失傳了。到中世紀後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各國（主要是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學者和醫生深入研究古希臘和羅馬的書籍，才使這門科學恢復了舊觀。可惜當時有不少巫醫，利用較深奧的醫學理論，尤其養神方面的理論，來欺騙有錢的人和地方官吏。他們騙人說，他們有「煉丹」長壽之術，結果對整個古代醫學起了巨大的破壞作用。隨着現代醫學的出現和發展，古代和中世紀的醫學逐漸被揚棄了；「四氣」說，「精神、肉體和外在物體」調理的醫療方法，甚至草藥（西方也有很豐富的草藥治療學！）皆被指為迷信而受到排擠。

一百多年來，新醫學（即「西醫」）得到了驚人的發展。但近十年來，不少青年和醫生開始認識古代西醫學裏亦有不少值得借鑒參考的東西。連二十—三十年代研究大量的古代和中世紀精神醫療資料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的工作，也受到重視。

中國的中藥，包括草藥和針灸等，也正變成西醫醫務人員的研究對象。社會上許多居民認識到，現在的普通西藥，大都有較大的副作用，結果他們要找尋「自然藥物」來治病。「自然」食品（即在生長時沒用過農藥的蔬菜之類），「自然」飲品和「自然」藥物於是盛行起來。書店也一定要有幾個書架把「自然」方面的書籍擺出來，以滿足讀者的興趣。

中藥幸免於文化革命的浩劫，正在得到醫學工作者的空前重視，這是個令人很高興的事件。因為中醫有許多特別的藥物和治療方法，是一門積累了幾千年醫療實踐的古老科學。在世界醫學裏，也正在受到重視，並將得到應有的地位。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香港人的「擠」術

初到香港來的外國人，頭一個印象往往是香港很擠。香港的「擠」跟其他地方不同。「擠」，不限於人多所造成的空間缺乏，而是牽涉到肉體、思想和感情上的擠迫。照我看來，這「擠」的主因有兩個：人口多，社會競爭強。

在香港社會，那影響可說到處皆是。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是：生活節奏緊張；一切活動講究速度和效果。雖然我自己並不是做生意的人，不能詳細地觀察商業人士之間的「擠」勁，不過，我住在香港兩年多了，倒經常有機會接觸街上人羣的「擠」術。

除了走路老是要排着隊，跟踉蹌蹌地的擠着往前走之外，香港朋友「擠」術的最常見甚至最高明之處，就是乘用交通工具。讀者請閉目想想這麼個鏡頭：傍晚下班時分，我下午就跑到中環辦事，事情辦完恰逢高樓大廈正在傾瀉

上千職員。這時，再加上已經絡繹不絕的顧客和逛櫈窗的人羣，於是，想搭電車去灣仔的人就多得嚇人。在車站候車的人呢？左顧右盼，在選擇一個最便於自己上車的地方。這一小段經歷的本身，就是對你生活知識的考驗。如果真正選中了離電車停車後門不遠的地方，那是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小戰鬥」裏的一個微小勝利。下一步是要跟左右的人擠，擠上剛停下來的電車。這時，胳膊、手提包、或裝滿貨物的塑料袋，都成爲你一舉上車的最行之有效的「助手」。誰都知道，不爭不擠呆如木鴉的乘客，決不會居於蜂湧上車的前列；過分老實的人唯有寄希望於再等下一輛。

上車後，下一個「戰鬥」任務便是「擠坐」。常坐電車或巴士的人都知道，香港「擠坐專家」是中年和老年婦女。別看她們身體瘦弱，擠上車不見得如何大顯身手，但到「擠坐」，她們却機敏而強硬得出奇。記得我一次站在一位男士身旁，到了一站他站起來準備下車，我便很自然地把屁股往空着的座位放下去。沒想到一位又矮又瘦的老太太竟會來跟我搶座。她可能以爲我這

「鬼佬」入了鄉而未問俗，不懂得搶座位。到我坐下來驀然不動時，老太太之驚惶失色的面容可想而知。我坐了四站路，便聽了四站路的對「有理由搶座」的「鬼佬」的嘮叨。讀者可能會怪我對年長的一輩太不尊重，那我只好請您在同樣情況下去搭電車，看看「超人」禮貌理論在香港的人擠人的交通工具上，是否能夠得到實現？

擠路，擠車，擠坐的知識和手段，在香港幾乎發展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來港的外國朋友若要在這裏立足的話（說的是窮仔們，有錢仔當然自己有車或有錢坐的士——其實泊車和「擠的士」亦是「擠車」的一門分科），遲早總得學一點「擠車」的本領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

香港——寒冷的夏天

香港的怪現象真是不勝枚舉。在香港住長了，對一些令人費解的事情，看得也就順眼了。上次談到香港人的「擠」術就是這種現象之一。筆者就是從一個相當溫順的人，變成與老幼擠車搶座的「積極分子」。香港如能在人們日常生活習慣的習慣勢力上動動手術，先不講其好壞，那也得肯定其非凡。初到香港的人，對香港另外一種怪現象亦會有些迷惑不解，那就是香港餐廳的冷氣。

我經常有些朋友和同學，從中國內地或海外來香港度假辦事。因香港夜晚除了吃飯看戲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娛樂（我的麻將打不好；跳不了）的士夠」結果往往只好出去吃飯，吃完飯再找個地方聊天。因為街上、公園裏擁擠得鑽不進去，就另找餐聽喝咖啡。無論是食嚼或飲嚼，香港大大小小的餐廳飯館都有一個共同點：冷得要死。

這裏夏天氣溫平常在攝氏三十度以上。外邊驕陽似火（好在近日太陽不多見！），曬得人直想躲起來。躲來躲去經常要躲到酒店大廳、咖啡屋或餐廳去。雖然避免了酷日，却又趕上了低氣溫對身體的摧殘。我在澳大利亞家裏，好像沒聽過夏天有人感冒，但一到香港就發現，因為空調過冷而受涼的大有人在。避熱乘涼的小聰明，常常鬧出不輕不重的身體危機來。

經過無數次的「寒流襲擊」，我和幾個朋友研究出香港菜館和酒店老闆裝冷氣機和放低氣溫的苦心。當然，香港萬事不離錢。餐廳把冷氣開得很冷，我想有兩個作用：一是叫人凍得想趕快吃點東西，以其所產生的熱氣，來驅散陣陣寒流。二是吃完了，出汗了，暖和一陣之後，冷氣陡然襲來，又叫人產生不得不動趕忙離開為妙的念頭。老闆真沒白當。用冷氣用得如此美妙：一會弄得人人想狼吞虎嚥，一會又叫人冷得不得不「埋單」溜之大吉。誰會想到十八度低溫背後還有如此高明的生意經，真令人衷心佩服。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塑料社會傑作——快餐店

現代化的社會用不着我來歌功頌德。看官光看看電視，就知道現代化工業社會及其產品如何受各式各樣的「歌德」（中國有「歌德派」，海外亦有之乎？）。像我這把年紀的人——我今年二十五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原子和核子彈黑影下長大的，享盡現代化社會的「福」，可說是個「原子孩子」。五十年代出生的小孩當時都被稱為「原子孩子」，但並非有什麼奇才，而是因為我們既能夠分享現代化社會的產品，也可能嘗到原子戰的苦味。

美滿的原子時代早已過去。說它美滿，不如說人在美滿中一直感到恐懼。自美國炸毀兩個日本城市、冷戰僵局形成以來，核子戰一直在威脅我們這些較有「福氣」的一代。在電影、電視、廣播和書刊的不斷誇張和渲染下，我們按慣電鈕，開慣汽車，也看慣各種機械和新鮮玩意的人，逐漸對這種現代化

帶來的一切感到不安，甚至厭惡。

看官們可能對六十年代西方學生和青年的「運動」始終有些摸不着頭腦。其實，披頭士樂隊狂，嬉皮「運動」的形成，「吸毒」的次社會，反戰運動，新宗教運動等等，都是這一代青年對撫養他們的現代化社會體制反抗的表現，是嘗盡甜頭感到膩味和反胃的過程。

我這樣嚙嚙，其實，只是爲了說明「塑料社會」這題目。現代化社會的速度和高效率的確來之不易。形成新社會經濟體制的代價非常大。雖然物質生活在幾個工業發達國家和地區，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豐富，但在提高物質生活同時，各國的傳統社會結構，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也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這變化說得好聽一些是一種「解放」，說得壞的就是一種毀滅，一種損害。我們這一代講起現代社會，往往聯想到它的主要產品和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塑料。頭戴腳穿的，用的看的，無不是塑料或者其他的代用品。塑料是工業社會的一個典型產品，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之一。

塑料在消費社會的重要性，使得我們很多青年把它當作整個社會的精髓。

「新」社會的「新」式人物我們叫「塑料人」；社會本身是個「塑料社會」；吃飯亦受到牽連，於是有一「塑料食品」。說實在的，我們青年不像中國的一些青年——「看破紅塵派」，我們是地地道道的「看穿塑料派」！塑料社會的偉大發明之一是快餐店。快餐店的興起，使「塑料思想」從肚皮侵入人體。快餐店聯號的老闆可能掌握了「新」社會的一個真理：塑料生活必需品是塑料菜。他們提供這種食品，一是能夠滿足節奏快速的社會需要，二是可以發大財。快餐店多，賺的錢也多。有幾家「賣當撈」快餐店（通譯「麥當勞」）我曾去領教，不講其麵包味道如何，也不提它夾的肉是怎麼來的，我只怪世界上最懂得口福之樂的一些香港青年朋友，為何這麼輕易地拋棄其胃口自由，而大量地吃快餐店的食品，大搞自我破壞？

「塑料自口入」，消化後把血肉的人體逐漸變為塑料人體。腦袋、思維和感情也就隨之變為以塑料為素質的東西。嗚呼，塑料社會禍害之深而且廣，不

亦可畏哉？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

試穿針眼樂無窮

100

拜讀了《新晚報》、《舒服集》阿妹的一篇文章——《單位》。文內列出漢語的數量詞之豐富，來證明中文難學。作者取笑「外國人學中文（一齣戲）」後就引用了洋人聖經的典故說「簡直是駱駝穿針眼的故事，上帝保佑他們。」真夠「仁慈」。儘管漢語難學，但是她還求神賜恩，幫助「智力弱者」的我們。

讀畢此文，不免爲作者文字的精簡俐落而仰慕。不過列出的數量詞雖多，用法亦特別，據拙見還漏了一個阿妹該熟知的量詞——「派」，通常用於「一派胡言」。

學外語是難，學漢語當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學過幾種語文——印尼文、法文、德文、梵文、巴利文、拉丁文、中文和日文——沒有一種能說不下一番苦功便能學會。中文有它的奧妙和難學的東西，如方塊漢字和聲調，但在

語法和讀音方面可比日文簡單得多，日文漢字却有音訓讀音，在漢語裏面只有一個發音的「生」字，却在日語有十幾個讀音、日語除了用漢字書寫以外也用平假名和片假名，還有大量的外來語。學起來有魁星、天神（日本知識之神，原係藤原時代的宰相，菅原道眞）降凡助攻，亦無濟於事。

夫英文者，雖然是我的母語，我還覺得掌握得不好。英文現在散佈全世界，英、美、加、澳（洲）、新西蘭都以英文爲國語。英文的這個「跨國性」，給外國人（這個範圍恐怕也得包括阿妹在內）造成許許多多的困難。舉個很簡單的例子：「bugger」。這個詞，按詞典的解釋原來是「保加利亞人」的意思，後來有「鷄姦者」，「賤人」和「無賴人」等意思。在現代英語裏除了這幾個意思之外，「bugger」在口語裏面不但常用，而且含義甚多（詞典上也不一定能夠找到）。比如說見到朋友時打招呼就說：「How are you, you old bugger」。疲倦不堪的時候也常說，「I'm buggered」。罵人是壞蛋就是「You buggered」。把一件事情弄得無法下場：「I've buggered it up」，出去逛街乃

是：「To go out and bugger around」。叫人滾蛋就斥一聲：「Bugger off」。自己出門也可說：「I'm buggering off」。叫人見鬼去就喊一聲：「Go to bugger」。有人問題無從答覆就來一句：「Buggered if I know」。隨便想出這個詞的用例，夠難爲想穿「英文針眼」的有志之士了吧。

當然學習漢語很難，一輩子會處於一個「還有三分學不到」的狀態。不過會說會看而且寫漢語的外國人很多。我就是從一位精通漢語的外國老師學的漢語。那位先生原來是比利時人，名字叫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筆名是Simon Leys 西蒙·利斯）。在北京外文局搞中國文學作品的專家，戴乃迭（Gladys Yang）漢語也非常好，跟我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同學，大部分現在用漢語搞翻譯和寫作。第一任駐華澳大利亞大使費思禁（Steven Fitzgerald）和現任澳中理事會執行官梅卓琳（Jocelyn Chey），也都是運用漢語很流暢的人。

中國的文字和語言有悠久的歷史，現代漢語也是一個非常微妙豐富的語言。

言。不過歷史再悠久，詞匯和語義再豐富還會有人學；也會有人學得相當好。中國人在穿英語這個窄小的針眼，非中國人也會穿中文的針眼，壓根兒不用上帝來保佑。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李平

美國第一次對讀者的調查

數十年來民意測驗同各式各樣的銷售調查在美國蔚然成風。作為一種既有社會科學又有心理學特點的銷售調查，在六十年代的大多數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裏，也已經成為一門專門學問而在很多歐美大學裏被劃成獨立的系別。自從它形成後，銷售調查就有異常直接而重要的社會意義。在目前高度現代化的社會裏，能夠及時而準確地反映或有時預見一個社會的各階層人對某一個政策、人物或商品的心態的學問，必定會獲得政治界及商業界的重視。美國可算銷售調查的發祥地，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讚許和運用銷售調查的國度。其實在美國有人笑道：「不管是政治家或資本家，動不動就要首先調查一番民意才行！」

雖然民意測驗和銷售調查在美國是如此普及，不過到去年中為止，美國從

來沒有人深入地研究或調查過讀者的狀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的美國出版界專業雜誌《出版者周報》，頭一篇文章揭示去年中的一個美國銷售調查公司對讀者調查的內容。雜誌報道，該公司的調查是基於在一九七八年五、六月間在美國一百六十五個城市對一千四百五十個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人選」的調查對象的訪問而形成。在十月份，此次調查的內容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圖書中心討論會上公佈於衆。

到會的專家紛紛表明，這樣的調查雖然有訪問對象數量上和代表性等方面等局限，但它無疑具有一定社會和商業性的意義。對讀者調查的結果，把讀者分成兩類：一、不讀書而專門讀報刊的人（他們是被訪問的前半年內沒有讀書的），佔百分之三十九；二、讀書者（在被訪問的前半年讀了一本書以上），佔百分之五十五。所剩下的百分之六自稱不讀書也不看報。

就讀書者而言，幾乎百分之五十（即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在被訪問的前六個月內讀了十本至二十五本書。讀書者中的絕大多數是白種人，一半以

上有工作，四分之一是家庭婦女，學生和失業或退休者佔的比率都比較小。調查者也指出，這類讀者並非都是中學畢業，這個事實就說明讀書的人不都是大學畢業的。

調查報告也指出，讀書最多的人是在三十及三十九歲之間，他們的讀書習慣也多半是在他們中學畢業以前已養成。讀書的興致如何呢？報告的回答是消遣（百分之三十六）、求知慾（百分之二十五），此外，讀專業書籍，因由宗教信仰或只爲了消磨時間等原因，佔的比率較小。

銷售調查公司在解釋其調查的結果時，也指出了若干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形。如愛讀書的人並不是喜歡孤寂、不樂意參與社交活動的人，他們反而是非常積極地參加各種各樣的娛樂和業餘政治、體育、文化、宗教等活動的。讀書的人和看報刊的人觀看電視的時間相似（一週十五個小時），比不讀書報的人少三分之一。讀書的興致是隨着一個人年歲的增多而減少的。愛讀書的人不時增加其所讀的書和雜誌的種類。但光讀報刊的人的閱讀習慣是比較保守的。不

愛看書的人，大部分說他們自小或在中學就較少或盡量少接觸書籍。這說明愛讀書與否一般是在青年時期決定的。

在兩篇探討這個「讀者調查」的文章裏，《出版者周報》的作者指出這個報告「雖然提出了很多問題，所提供的答案却甚少」。但評論者自己沒有很統一的看法。一位出版家說，讀書的人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如果要擴大讀書界，出版者就得從啓迪人民對圖書的興趣着手。從這次調查看來，發行布局和平裝、精裝書價錢的差異並不重要。但他也指出，調查顯示了婦女讀者的比率較大，這說明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也許因為婦女還不能夠充分體驗到男人在社會上所能夠體驗到的東西，因而力圖從讀書中去填補這個空缺。

調查對讀者喜愛什麼類的書也有談及。最受歡迎的是傳記一類的書籍，自學或「自助」圖書也頗搶手。有意思的是被訪問的人所喜歡的書只有四分之一是屬於暢銷書，大部分也不是近幾年出版的。上述的調查顯示同美國大出版社

進行的一些局部銷售調查的結果相似。

調查報告內容公佈後，在探討和議論美國出版的未來時，有人指出讀報刊而不讀書的人應是出版者爭取的對象，政府和大出版社的工作應以這類人為重點。斯丹福大學銷售系副教授威尼堡指出，雖然讀書的益處和樂趣可說是家喻戶曉，不過啟迪不讀書的人，決不是一兩天的全國性推廣運動所能夠解決的，而是需要作長期、有充分準備而分別對象的工作，才可能實現。

美國這一次「對讀者的調查」只不過是第一次，而且僅僅是爲了更多更細緻的工作做出準備的。調查結果的可靠性和普遍意義，只有經過長時間的廣泛調查和研究才能獲得證明。

（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

從《火星人》談到《星球大戰》

——讀《約翰·環咸小說精選，一九五一年——一九六一年》隨筆

太空運輸公司職員頓肯·威法自公司火星分站被派遣去木星二號月球當管理員以前，就考慮到：長期棲身於淒涼的木星月球必然需要一個伴侶。在這個預想的激發之下，他買來一個「價廉物美」的火星少女萊莉做他的「太空太太」。

按照二十二世紀的常識，火星人都是非常遲鈍的。作風一事不苟的威法發現，他的新娘跟她的所有同胞一樣，是一個極其笨拙的東西。大筆金錢已經花掉，後悔也太晚了。爲此，夫婦倆抵木星二號月球後，威法只好將萊莉（他的

傻火星人）當做婢女來使喚。只有這樣做，萊莉的身價才不算是浪費的。

沒有想到，木星二號月球很快就被選為公司地球科學家艾倫·惠特的勘察對象。夫妻倆和艾倫住下以後，不知是因科學家們的人性觀向來很強，還是只由於艾倫同情萊莉的處境，艾倫和萊莉很快就成為促膝談心的老友。

在艾倫的鼓勵和幫助下，萊莉迅速地學會了讀書和計算。從前一直被輕視為「不眨眼的傻瓜」的她，在這位仁人志士的引導下，就踏入了一個豐富的精神性世界。

不過，威法花幾千英鎊買她，並不是為了向萊莉提供教育的方便。自然而然，他把使妻子「文明」起來的艾倫視做眼中釘。

一天，艾倫出外勘察山區，莫名其妙地失蹤，其實這也不足為怪。萊莉不見這個伙伴歸來，除了往窗外張望幾下，也沒有露出更多的情感。威法看到萊莉平靜如常的面容，這才消退了他的懷疑——他曾懷疑「他的傻瓜」會有謀殺他的心計。

五年期限滿期前幾個月的一天，威法送還一支太空箭後，發現萊莉把運輸站宿舍的大門關死了。他這才知道，原來萊莉蓄意已久，只等候時機，來為被威法害死的知音艾倫報仇。

威法吸盡氧氣管裏的氧氣，在他妻子萊莉的注視下寂寞地死去。室內的萊莉並沒有心思去考慮對他的哀與恨，因為她忙着要計算數年來丈夫積累了多少薪水。

在五十年代以數部長篇科學小說聞名於世的約翰·環咸（John Wyndham）就是這樣運用簡練的筆觸，寫出一個數百年後的「想像婚姻」。西方讀者最熟悉的環咸作品，是他所寫的反映全球性災難的長篇小說。不過，像《約翰·環咸短篇小說精選》（The Best of John Wyndham 1951-1956）裏這篇《火星人》短篇，同樣能夠顯示出環咸的寫作風格和特點。

環咸不像那些僅憑空想，躲開現實的「時髦」科學幻想作家那樣膚淺。他和受到他寫作風格影響的作者一樣，善於把對未來的設想和估計同現存社

會的真實人事結合起來。因此，這些作品不僅有較為可信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而且作者能夠通過豐滿的想像，使描繪出來的故事既有消遣趣味，又有一程度的社會意義。

在探討科學幻想作品的含意時，往往被人忽略的一點是作者本身的處境和意識環境。無論科幻作品寫得如何深奧或奇特，它始終受到作者身處的時代和他個人思想的直接支配。所有環咸的災難性作品都顯露出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五十年代期間，人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核子戰爭懷有恐怖情緒。雖然短篇小說《火星人》裏把萊莉描寫為火星人，但是，她的性格和特徵無疑基於歐美那些長期受夫權壓抑的家庭婦女的形象。小說的男主角威法也只不過是代表不顧別人利益，只求自享其福的男性沙文主義者的典型罷了。

如果說某一個科學幻想作家真正有意反映所生存的社會，讀者只好從多方面向作者及其作品進行探究。筆者認為，一個作家如要真實地寫關於幾百年後社會的作品，除非他拔着自己的耳朵飛到廿一世紀，恐怕只能按自己的思想和

社會經歷來寫出他對未來的一些想像。科學幻想同文藝的其他種類一樣，直接或間接反映創造者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正因為如此，作品往往對現存社會有所評價或有所揭露。在美國引起近年罕見的科學幻想熱潮的影片《星球大戰》，不僅是為了幾百年後星座之間的戰爭做輿論準備，也許還為今後一定時期很可能會爆發的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作及時的思想預備吧？！

(二二)

書寫

「淫穢語言」和美國的言論自由

「自由」、「民主」等詞，講起來往往跟武裝革命、立憲鬥爭等東西聯起來。

其實爲自由或民主確立的鬥爭，雖然經常和流血和殘酷搏鬥有密切的關係，不過確保和繼續發揚民主自由的過程，也往往是漫長而跟有浪漫色彩的「鬥爭」兩字毫無關係。換句話說，大自由大民主有大自由大民主的爭取方法，小自由和小民主亦有其爭取方法。前幾天我就看到了一篇反映美國這個被稱爲有「充分自由的國家」裏的一件有關小自由的事情。

到了一位朋友家，我隨便翻開了一本由歐洲廣播聯會出版的專業性雜誌——《歐廣會報》(ECU Review)。偶爾翻到了關於美國廣播近況的一則消息，報道了美國最高法院對一宗廣播淫穢語言和言論自由案子的判決。案情的

經過很簡單。

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紐約市的一家廣播電台(WBAI)，播送了一個關於「淫穢語言」十二分鐘長的專題節目。節目內容本身並不「鹹濕」，而是企圖通過用罵人話和淫穢的語言來諷刺社會上一般人對這種語彙的厭惡和反感。但電台自作聰明，弄巧反拙了。播放該節目是下午的「黃金時期」，正巧被一位「美國監督傳播媒介純潔性」業餘組織的成員收聽到。這位「義士」挺胸而出，立即向美國廣播管理署提出抗議，認爲播送這種有腐蝕性節目的傳播媒介，應受到官方審查。

雖然廣播管理署同意起訴者的看法，但因爲美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機關無權限制言論和出版自由，人家想罵娘罵到天上去，廣播管理署也沒有實權取消一個廣播電台的播送權。結果管理署就通知了紐約電台，下次要延續台證時可能因爲這件事引起麻煩。電台不但沒認錯向官老爺們獻媚，反而義憤填膺地去法院告廣播管理署的狀。在此不必贅述各級法院上的正反供詞，或美國傳播

媒介集團內部對這宗案件的種種反應。只簡要地說明一下，區區十二分鐘的廣播在美國市、州和全國最高法院折騰幾十個人長達四年半之久的時間，才告一個段落。

光談四年半的法庭辯論，無不承認美國對法律的高度發達和尊重。恐怕隨着最高法院的判決，廣播台和一些廣播企業會指出法院的判決違反美國憲法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因而要求重審。這樣，事情已不僅是十二分鐘的國罵、州罵和四字經的朗讀，而關係到美國政府機關和法院對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一條的解釋和態度。因此，區區小事，足以影響到堂堂大官或森嚴可畏的機關的可信性以及其決定之合法性。所以雖然美國如其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很早就經過長期鬥爭而確立了民主和自由的一些基本原則，但這些原則，迄今仍受到實踐和歷史的考驗。恐怕個人、集體和國家三者的自由和相互之間的關係，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許多國家依然是個難以解決的課題。

（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

時不再來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句話現在常見於農業生產有關的報道裏。「時不再來」雖只寥寥四個字，但却含有一个真理——一個時期或時代已流逝過去，就不會再度出現。這意思跟崔顥《黃鶴樓》詩句中的「一去不復返」，含意相近。

七十年代已成爲歷史。八十年代的頭一年一九八〇年，剛剛開始，這就可以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許多西方國家有這麼一個習俗：一年快到頭，到了元旦前幾天，人人回想過去一年的得失成敗，個人有哪些地方做得問心有愧，於是努力懺悔，下決心在新的一年改進做人之道。以十年之長，或整個一個年代而言，更需要回顧和檢討。不僅一個人要這樣做，而且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亦應當這樣做吧。

國外的人常說澳大利亞這個國家歷史太短，傳統不牢固，經驗膚淺。也常有人以為澳大利亞既沒有數百年歷史，則「國家意識」和「國家記憶」難免單薄。其實，我倒覺得未必。雖然我們是年輕的國家，但經歷豐富，從過去可總結與吸收的教訓亦甚多。不過在另一方面，澳大利亞這個國家由於歷史短，對過去的認識和記憶應當很清楚，但她跟許多古國和大國一樣，却容易把過去的痛楚忘却，對昔日美景加以無限的渲染。

六十和七十年代這二十年的世界歷史，好像被壓縮了一樣。二十年內多少國家興衰，又有幾次革命爆發而終於歸於消滅？或是理想跟泡影一樣破滅了？這二十年，也是澳大利亞自發展為先進工業國走向無限通貨膨脹而無法控制失業率的過程。剛剛踏入八十年代的澳大利亞政治家，跟許多其他西方國家的一樣，在追尋過去的黃金時代，發誓在民眾的支持和努力下，使八十年代成為國家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但是，這些只考慮到下一屆大選的人，楞不相信「時不再來」的真理。他們不懂得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是相互影響的，牽一髮而動全身

的國際經濟制度，是不准單幹戶的。要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或政治，決不能以爲對過去的十年或十五年加以否定，就會恢復當年的情景。

美國要是想利用伊朗危機解除政壇的信任危機，而恢復肯尼迪時代的局勢，恐怕未來等着她的，只是冷漠和苦笑。在中國，亦有不少人以爲，通過種種行政形式和宣傳工具，對那十年的慘痛經歷加以抨擊，一九六六年前的精神面貌和政治氣氛就可以出現於世界，這同樣是忽視現實，欺騙自己的理智。世界變了，中國也變了。以五十年代的思想去解決八十年代的社會、政治和生產問題，不但將無濟於事，弄不好還可能翻車。

伊朗霍梅尼先生的十七世紀意識雖一時通行無阻，但在那裏，革命口號因喝不上水而喊不響，遊行隊伍因吃不飽飯而解散；再有威望的人也站不穩的。

時不再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個民族所嚮往的，在那個時代結束後，是極難重現的。如能適應社會的種種變化，以民衆意識的豐富，總可

創造出一個更符合歷史發展的嶄新精神和趨向來。單憑過去的詞句和作法，恐怕行不通。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七日)

120

方序

從暢銷書談起

暢銷書是一種自找麻煩的東西。一個作家出了一本受歡迎的書，就比較容易得到出版社的支持。要出第二本的時候，出版社就像軍隊的司令部一樣向他組織攻勢。有了出版社的賞識，作家的新作就可以在書店櫥窗和書架上獲得顯著地位。大量的宣傳材料和各種刊物上的書評都會有助於「製造輿論」。雖然暢銷書跟社會上的其他商品一樣，靠包裝的華麗，廣告的繁多和評論家的讚賞，但要是真正打開大銷路，關鍵還在衆人口碑。

加拿大作家阿瑟·赫里（Arthur Hailey）可謂暢銷書大王。他的小說像《機場》（Airport）《輪》（Wheels）、《酒店》（Hotel）和《銀行家》（The Moneychangers），不僅在北美洲博得衆多讀者，而且通過二十幾種語言的譯文，也成爲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我是住在中國的時候才頭一

121

次聽到赫里的名字，中國朋友給我借來了赫里的一本小說，講的是「文化專制」時代的事，後來又讀了幾本。現在赫里在中國是個「地上人物」，恐怕他的書正在中國這個新大陸上獲得讀者吧。

既然我承認從前讀過幾本暢銷書大王的作品，我還不能算爲「他的人」。不過，前幾天在圖書館看到赫里妻子所寫的《我和一個暢銷書作者結婚》時，好奇心起，於是將書借回家看。赫里夫人的文筆流利，但染上了她丈夫的華而不實的文風。反正我無意評論這位女士的文筆，主要是看她怎樣介紹她丈夫的寫書過程，以及若干關於他青年時代的資料。

赫里的作品雖然不能說對世界文學史有多大貢獻或有多大價值，不過他的幾本「搖錢書」確有其吸引讀者的特點。這些特點赫里夫人也提到了。赫里是對某一個題目經過非常細緻周詳而長期的調查訪問後才動筆的。作品內容的高度準確性，經常獲得有關專家的讚許。讀者寫信給赫里，往往稱讚赫里的作品的人物刻劃到人物所活動的環境，都寫得淋漓盡致，非常真實。這是赫里作品的疏遠感。

主要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這位作家能夠成功地以現代化的社會背景，來烘托所塑造的各種人物。赫里不像一些作家利用電子時代的外表來掩蓋其人物和主題的平庸，而力求讀者認識和熟悉種種現代化設備的機能和使用價值。有些讀者說，赫里的書除了消遣作用外，也能夠減少讀者對愈來愈非人格化社會的疏遠感。

自哲學和處世方面來講，暢銷書大王赫里是一個很坦誠正直的人。他以真實而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作爲他塑造的不同階層人物的活動舞台。他在肯定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提下，描寫這種社會的人情世故。對許多讀者來講，赫里的小說不僅是一種精神解脫，而且是一個與現代化社會認同的途徑。

經常讀中國文學作品的人會感到，在幾年前爲某某政治運動服務的作品，不但不會像赫里的小說那樣闡明社會，反而會故意歪曲社會的狀況，塑造虛假的人物典型，力圖達到一個臨時的政治目的。當然，這種「文學」很快就會失去現實意義。因爲它本來沒多少可讀性，它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也不大。可

惜，中國的文學作品大部分還是帶有藝術外表的應時政治之作。這也無可厚非，只盼望給讀者多一些選擇的餘地。

話扯遠了。用意無非是在強調：想瞭解一個社會的實質，莫如多讀它的文學作品。而要想瞭解一個作家的思想，莫如廣泛瀏覽他的傳記資料。這道理是簡單的，但實際上，有些中國和海外的讀者甚至評論家，太容易滿足於讀一個作家的作品，而不求更深的認識。

（一九八〇年四月六日）

電子時代的隱患

澳洲的日報社不大能把我算在它們季度統計數字裏。這不是因為我懶得不關心天下大事，也不是我特別吝嗇買報紙那幾個錢。不看報的主要原因是，本地的日報空洞無聊，已到一個驚人的地步。恐怕連看慣了中國大陸「文革」式文章的人，也會發現澳洲的日報比「四人幫」宣傳機器還略勝一籌。除了窮鄉僻壤阿貓阿狗的不「新」又不值得「聞」的記事外，難得找到一些可看的東西。上星期在朋友家裏看星期天的報紙（星期天世界各地都在休息，大多不會發生什麼新聞，故許多編輯老爺特意把這天報紙各欄塞滿廢話，混過一週的難關），翻一下就放下了。目光橫掃舊報紙堆，在最後一頁的下角，這個不常引人注目地方，倒發現一則叫人深思的趣聞。

說有一位富翁，今年送他愛子的生日禮物是一塊液晶數字顯示手錶。兒子

雖然年幼，却已有趕時髦之心理，很喜歡這個「太空時代」的小玩意。富翁寵愛兒子，以為這個錶有十幾種功能，外觀又精緻悅目，在小伙伴中大可顯示家庭的經濟地位，這對培養兒子的自信心和優越感也很有好處。那孩子於是無時不戴他的新寶貝，連洗澡時也要試試手錶的防水性能。不多久，同班的同學都通過種種高壓手段（不外是發脾氣，摔東西，發誓絕食等），也弄到了液晶手錶。當然，華麗到富家子弟那樣的却一個也沒有，富翁很高興。

事情並沒有在這個階段結束。若說「富貴在天」，則聰明在人。有一天，富翁跟兒子在外邊買東西，問兒子商店掛鐘上的時間，跟他的寶貝錶是否分秒不差？兒子看掛鐘看了許久，告訴他父親，他看不懂。富翁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細問之下，果然是看不懂。兒子怕老子生氣，罵他笨蛋，就推托說，手腕帶的液晶錶，四四方方的顯示盤上有數字可依，不用看那些又圓又古怪的大鐘，反正知道這個時間就行了。何必要看得懂其他鐘錶？那富翁深知現代社會只講知識專業化和使用價值，這時很有感觸。第二天到孩子的學校問老師，

有幾個人像他兒子一樣看不懂舊式鐘錶。經過調查，發現低年級的學生三分之二只會看數字顯示錶。後來怎麼樣，報紙沒有講。

讀完這個報道，心裏很喜悅。我在香港住的時候，液晶數字顯示錶就上市了。很快又在香港老百姓手腕上展開爭奪戰，鞏固了地位。當時我很討厭這些錶——要按芝麻大的鈕，錶面才顯示出數字來。若在電車、巴士上想瞧瞧時間，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沒被衣袖遮蓋的手錶，再一看，錶面則是一個絲毫不體諒旁人的黝黑的洞洞。這時就覺得普通的顯示錶也許方便些，但比舊式鐘錶還是遜色得多。我沒想到，許多青少年竟因此而在舊式鐘錶面前成爲瞎子。

舉一反三。孩子們用電子計算機做數學；放學後回家看電視，寧願認十幾吋屏幕爲爹娘而不肯看書用腦子；騎小型摩托車而不愛自己走路；等等。過不了幾年，硅集成電路普遍運用以後，人類不用動腦筋而學習各種知識的就多着呢。不知還有幾年，學校會發現不認識英文二十六個字母、自己名字都寫不

好的學生佔其多數……。一切爲了簡單方便，是聰明人的辦法。但要人人都向一個知識狹窄、本領單一的愚昧標準看齊，難道就是人類演進的下一步嗎？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西方的現代化迷信

對西方現代化的迷信，近年來在中國是有的，其實若依筆者拙見，在國際上也有。

對西方現代化的迷信在中國報刊上出現的歷史不長，但在國外，早已流傳很廣。當然，兩者的含義，並不完全相同。在西方，「現代化迷信」泛指由於各種信任危機而產生的五花八門新宗教；帶來科學色彩的荒誕學說；和逃避現實的種種新式（或「提煉」過的舊式）精神支柱。除了一本正經以嚴肅面目出現的現代化迷信外，也有種種披上文藝或者娛樂外衣並博得廣泛「信徒」的迷信。

這些迷信，在西方社會或受西方影響的社會觸目皆是。僅從《星球大戰》影片放映以來所產生的「太空人熱」，也夠說明現代迷信流傳之廣和影響之

大。《星球大戰》（第一、二集），《第三類接觸》和《超人》在西方各國和亞洲不少國家的觀眾中，都激起強烈的響應。天天聽到國際局勢緊張、第三次世界大戰迫近等等新聞的觀眾，大多樂於相信：天外有一種比地球的人更聰明得多的太空人。從經濟問題產生生活苦惱、從國際局勢引起恐怖感的人，就在這種沒有儀式教規的新迷信信仰裏得到寬慰。這不是二十世紀科技化帶來的現代化迷信，還是什麼？

這「太空新教」只不過是一例。這些新迷信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我相信，現代化迷信的存在與否，不是一個需要論證的東西。值得討論的，反而是其產生背景和原因，我估計這是對各國社會都有益的。這種研究已有人在進行。雖然沒有甚麼一致的結論，不過要想概括的說明現代化迷信的主因，恐怕並不一定先要念一個博士學位不可。簡單地說，西方社會的現實，和人們的幻想、科技的發展和信仰的可信性（無論是宗教或什麼主義）之間，都有差距，而且這個差距在不斷增加。

看來，這鴻溝絲毫沒有縮小的跡象。在鴻溝有增無減的情形下，現代化迷信就要不斷出現，層出不窮。但人們不能埋怨旁人以新迷信來麻醉自己。在世界上，令人不滿意的人實在不少。許多國家的政府和經濟集團也不是不懂得這個情況，他們大概就是種種現代化迷信的最熱忱支持者。中國吃了自己特製的迷信之苦多年以後，希望他們對於西方現代化，在啓蒙工作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

談談「學習小組」

在中國留學三年期間（一九七四—一九七八年），有緣參加「學習小組」。學習小組這個東西本來無可厚非，一周碰頭一次或數次，討論學習心得、國內外大事等等，甚有益處。要是一聚會不談什麼大事，光聊天胡扯也不礙事；至少有一個大家見面交換意見的機會，這對一個以集體活動為主的社會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不過，在怪事不斷湧現的中國十年，學習小組却是最大的「廢話派」進行心理戰術的最靈敏有效的工具。當時身為外國留學生的我，本來不必參加什麼小組會，照中國政府規定，也不該參加什麼政治活動。但為了瞭解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我們幾個外國留學生自告奮勇，組織了政治學習小組。當時恐怕只有在北京和瀋陽的幾個外國人會如此自討沒趣。雖然現在回顧當時情景覺得有些

可笑，不過自另一方面而言，居留在一個陌生的社會，非想盡辦法瞭解那個社會，就無從同當地人交朋友。

現在，我還不時想起「文革」後期噩夢一般的情景。但是時過境遷，三個星期前我已從澳大利亞到了日本。現在在讀澳洲國立大學舉辦的「集中日語課程」的最後兩個月，採用「長途開門辦學」形式，來日本就地學習。我學習日語的動機和進一步瞭解中國分不開。因此到了東京後，就想知道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的一些情況。沒想到，六年前跟我一起學中文的同學，現在在東京大學東洋史學部念碩士。這位朋友知道我對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感興趣，就熱情地帶我到東大的中國文學研究室，並且把我介紹給日本的魯迅專家——丸山昇教授。

丸山昇先生知道我的日文還是在牙牙學語階段，就用一口流暢的中國語跟我交談。在西方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裏，會說中文的還是少數，奇怪的是在學習外文不得力的日本學術界，我已發現了不少中文能說會道的學者。跟丸山教

授交談時，他提到參加的一個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研究會。過去我知道日本的研究會衆多，但因為不大瞭解研究會的具體內容，就向他請教。他熱忱地要我參加。

研究會當天下午開會。丸山教授領我到東京東洋大學研究所的一個小會議室，參加每周舉行一次的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研究會。那天下午參加的只有六人，其中有東大、琦玉大學和國學院大學的研究人員。他們長期研究的題目是魯迅編的《作家》雜誌。每一周，小組的一個成員先讀《作家》裏登過的一篇文章（我參加的那天是于黑丁寫的《路》），然後大家討論。據丸山教授說，研究會一半是聊天，一半是正規的研究。在我看，兩者的結合能產生一種隨和而認真的氣氛。不同學校的人，有機會碰頭交流思想也很有意思。

除了正式列入「議程」的項目之外，有一位學者還拿出他剛弄到手的《日本手冊》（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和北京社會科學院出版的《日本的中國學家》（嚴紹溫編著）進行討論。

可能是西方人的個人主義太突出，據我所知，類似於日本研究會的形式在西方國家沒有。若有，恐怕開不了幾次會就會有人以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集體研究徒成空言。中國「文革」後遺症之一，是對小組會議的普遍反感，若有所研究會，也難免「一言堂」的侵入。目前中國大都市和單位都設立什麼研究室、研究所，甚至研究院。依陋見，與其花費巨資，不如都搞一些小型研究室、閱覽室，讓志同道合的人有一個聚會之地。如能這樣做，說不定會對廣開才路有相當的貢獻。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忘年還是忘我

日本《現代精神》一九八一年一月號是中國人和日本人專輯。裏面有一篇內山完造（前上海內山書店經理）遺作，題目是《相互瞭解》。文章雖然講的都是幾十年前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相互瞭解問題，但其中還有一些值得現在讀者思考的地方。在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十五條認識裏，最引起我興趣的是認為日本人經常爛醉如泥。

內山先生說：「無論怎麼說，誰也無法否定這一條。喝醉酒無疑是日本人最大的缺點。」我在日本雖然只住了兩個月，但恰逢歲末「忘年會」頻頻召開之際，日本朋友大醉之狀是屢見不鮮的。

「忘年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會？「文革」期間我在中國住了幾年，自以為什麼五花八門的會都看到過，出席過：學習有學習小組會；傳達「聖旨」有

傳達會；下去勞動有歡迎會；勞動競賽有挑戰會；停課前也有歡送會；犯了錯誤講錯了話就有自我檢討會。還有慶祝會、動員會和誓師會……。大會小會數不清。只是沒聽說有個忘年會。

中國的新年聯歡會、春節聯歡會都在節前幾天開。日本的忘年會就不同。好像大和人以爲歲末應該自十月算起，因此忘年會在距離年終尚長的日子就有人舉行。形式如何？我不敢裝專家，不過前幾個星期倒有「幸」參加一兩個忘年會。忘年會的宗旨是，把過去的一年忘得乾乾淨淨，要喝得爛醉爲止。

參加忘年會的人一般都是同事或同行。我去年十二月初在東京的西荻窪，參加了戛爾巴杜斯之會的忘年會。戛爾巴杜斯是法國出產葡萄酒的地名。不消說，會員都是作家、演員和翻譯家。下午五點半在一個大會館開會。先在樓下簽名，掛名牌，然後上樓，進會場。一進門先同幾位負責人握手問好，接着就有人給你戴「派對」帽子（鮮艷的粉紅色，橙黃色或蔚藍色的綢緞紙做的），



和金紙銀紙做的頭飾。嚴肅而老態畢露的會員們，經過這一番返老還童的「手術」之後，就像小孩子似地跳進會場，圍桌而坐，開始喝酒。

請我參加這次忘年會的是德國文學名著翻譯家、日本筆會負責人高橋建二先生。我們一起進入會場，同時戴上帽子，套上頭飾。七十七歲的老教授就這樣「武裝到牙齒」地上陣了。來客陸續入席之時，我們就開始碰杯敬酒。不久，台上出現了一個主持人，他那揚聲器和在旁邊的鋼琴，陡然給晚會帶來夜總會的情調。

接着，晚會正式開始，四個半小時之內，他不斷介紹老會員講話，歌手唱歌，還主持一個「蚤市」，把大家帶來的「蚤市送禮」拍賣，為他們的會捐錢。沒想到，他也會來把我這個唯一的「外國人」也拉上台，用日語作自我介紹。感激上帝，會已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席上的朋友們都有此酒意，他們不介意我的洋腔日語，更不在乎我亂用敬語。到忘年會結束時，我又被拉上舞台唱歌。——日本人喝酒喝到迷糊狀態時，就紛紛跳起來唱歌跳舞。好在誰都有點

酌酌之意，我唱的歌和我這個離調一千里的「洋像」表演，不必詳述。

這個忘年會召集的目的是爲了讓文藝界的老朋友見面相識，談談過去一年的事情和更早的往事。終年忙碌於搞自己工作的人，很珍惜這麼一次見面和娛樂的機會。但其他類型的忘年會很多。高中時代的同學，大學「同窗會」的學生，大小公司的職員，家庭婦女，紛紛舉行忘年會，也都離不開酒和歌聲。

據我觀察，日本人對喝酒同他們對工作和事業一樣認真而徹底。喝就得喝得天旋地轉，玩就要沒命似的玩。這到底是爲什麼呢？我尚無法揣摩透。在日本的社會裏，有種種無形的壓力和無聲的要求，在纏繞着每一個人。其實，這跟其他社會沒有多少分別——生活在任何社會，都會遇到很多阻力和限制。但最使我奇怪的是，日本人解除社會束縛的方法，跟其他人不同。雖然忘年會是一年一度歡聚的盛會，但他們天天下班後，也常和同事、朋友或同學下館子，去酒吧，與此無甚分別。

為什麼會有這種喝酒忘我、大醉不省人事的心理？我想，若要瞭解日本和日本人，就得考慮這個問題。——這時你也不妨到酒吧去喝它幾盅。

（一九八一年一月九日）

日暮里和魯迅

前些日子在日本的一個文藝家「忘年會」上，我作自我介紹後，有人知道我對日本學者研究魯迅的工作感興趣，就勸我看一看《文藝春秋》最近登的駒田信二先生的這篇文章。看了之後，覺得作者通過幾個簡單的例子，提出了一些較新鮮的看法。他並非在鵝蛋裏挑骨頭，而是對編譯文學作品的人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即註釋的重要性。

幾十年來，中國國內出版有關魯迅的著作很多，但為魯迅作品作註釋的大權，一直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結果，外文譯文也受到影響。現在提倡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我想魯迅這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豪也應當人格化。在日本，就有人較客觀地看魯迅思想的發展，中國也有人想這樣做。在迎接魯迅誕辰一百週年的一九八一年，似應把魯迅的研究工作和魯迅作品的翻譯工作，從偏激的政

治需要解放出來。

在上海機場買了一本魯迅《朝華夕拾》英譯本 *Dawn Blossoms Plucked at Dusk* (一)，這個小冊子在飛往東京的成田機場時就看了一遍。我讀英文比較吃力，但因為過去看過《朝華夕拾》的原文數次，也曾經翻譯過，所以在飛機上看英譯本時，魯迅原文不斷浮現在我眼前，可以說看得相當順利。

看的時候覺得翻譯挺不錯。不過也覺得有一些地方，譯者較簡易的譯文未能讓作者原文含意得到再現，就是說有些地方未把作者的真意傳給讀者。飛往成田機場的三個半小時行程，就這樣很快過去了。

《朝華夕拾》十篇作品中，日本人比較熟悉的一篇是《藤野先生》(一)。這篇裏有這麼一段話(二)：

「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麼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

英譯本譯文如下：

「Soon after leaving Tokyo I came to a station called Nippori; somehow or other, even now I remember the name.」

「不知怎麼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一句裏的「不知怎麼地」被翻成 somehow or other。我對這個譯法感到疑惑。從我這麼一個英文知識不豐富的人的角度看，somehow or other 的意思是「不管怎麼樣」，不過我這樣說可能是因為我不太懂英文，抑或 somehow or other 也可能有「不知怎麼地」的意思。(譯者按：有這個意思，原譯無誤。)

更令我感到不滿的是，雖然在譯文裏日暮是照日文發音寫的，但沒有註明日暮里在哪裏(四)。我想這個地名沒有註釋會使英文讀者提出疑問：為甚麼出現這麼一個名詞？

日暮里這幾個字本來也有一個意思。因此寫爲 Nippori 的時候更有加註的必要。至少應當說明「日暮里」這個地名也有「黃昏村莊」的意思。

魯迅初次赴仙台是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九月。即使《藤野先生》

這一段話是寫魯迅頭一次離開東京去仙台的事情，但實際上一九〇四年日暮里還沒有一個車站。再者，魯迅寫「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是跟他當時的心情有關係。他在東京跟那一羣「清國留學生」的同胞有點疏遠感，就決定一個人到他根本不瞭解的仙台去。在路上感到孤獨和寂寞，所以日暮里這個地名就留在他的記憶裏。

「不知怎麼地，……還記得這名目」。這一句話也是爲了強調他當時的孤獨感。既然如此，我想“somehow or other，even now I remember the name”這句英文就跟原文不同。無論怎樣說，NIPPORI 應該有註解。

在原文日暮里後就出現水戶這個地名：「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英文却譯爲：

「The next place I remember was Mito, where Chun-shui who was loyal to the Ming Dynasty after its downfall died in exile。」

「明的遺民」被譯爲「loyal to the Ming Dynasty after its downfall,如果有註解，說明朱是一個忠於明朝拒絕爲清朝臣民才亡命到日本的人，恐怕對英文的讀者就更容易懂些。魯迅爲什麼在東京和仙台之間的路上只提到這兩個地名？這不是一個對英文讀者來講更難理解的事情嗎？」

Chu Shun-shui的名字出現處有腳註：「在明朝覆滅後，他到日本去求軍事援助，後來居留日本做學者。」不過雖然有這個註釋，我認爲魯迅在路上記住朱舜水死亡的地方——水戶，這和日暮里同樣需要說明。

在《藤野先生》的開頭，魯迅曾對當時「清國留學生」將他們的辮子高高地盤在頭頂上有所描述：

「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絢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梳辮子本來是滿族人的習俗，漢族人不梳。明亡後清朝初期梳辮子是滿族

人強加於漢族地區的習俗，不留辮子的漢族一律殺戮。

以其畫幅留給今人欣賞的中國明末名畫家八大山人，就因為厭惡作為對滿族統治屈膝象徵的辮子，毅然削髮為僧，以示反抗。朱舜水同樣為了表示對清朝不服而亡命日本。

回國數十年後，魯迅寫了這麼一段話：「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五) 魯迅到日本第二年便把他的辮子剪掉了。他在東京參加的革命組織的口號是「滅滿興漢」，那個組織是以推翻滿清建立一個漢族共和國為宗旨的。魯迅在《藤野先生》提到水戶時說「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是為了表白他自己的意向。雖然魯迅只輕描淡寫地提到這件事，他另外寫出兩個地名；這意思就較明確。在譯文裏沒人留意這點，使我感到氣惱。

後來，魯迅在日本東北醫專學習期間，幾次在仙台與東京之間的路上坐火車。他有一次在水戶下車去瞻仰朱舜水的遺蹟。日暮里車站是在一九〇九年

（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啓用的；魯迅無疑從火車上幾次看到站名才留下印象的。

（原載《文藝春秋》別冊「新春特別號」，一九八一年一月）

①見Mr. Fujino, Selected Works of Lu Xun, Volume I, Translated by Gladys Yang and Yang Hsienyi, Peking 1956. 本文引用的譯文皆選自《朝華夕拾》單行本。

②日本中學生以《藤野先生》的日譯文為教材。

③此文引用魯迅的作品皆按《魯迅全集》第二卷第四〇九—四一七頁的《藤野先生》原文，日語譯文全略。

④日暮里現在是東京市東北山手國鐵線站，已算東京市內的一個車站。

⑤見《病後雜談之餘——關於舒憲憲》，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九〇頁。

本文作者駒田信二（Komada Shinji 一九一四年—），現任私立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客座教授，東方學會會員，日本文藝家協會會員，文學評論家，

中國文學研究家、作家。他曾編譯有關中國話本小說和近代文學著作。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8

考試地獄和蜘蛛絲

若中國尚可稱爲禮儀之邦，則我想日本不愧爲考試之國。去年一月在澳大利亞開始學習日語第一周，我就接觸到現代日本教育制度的基石——考試。說是接觸不如說相撞。不瞞讀者說，我和考試、小測、大測以及考核等等，相處得甚不愉快。我同扶桑國這個「外籍」考試初次相識，就感到幾分敵意。一年來，雖然每週較量一次（甚至幾次），我可自豪地宣稱一次也不曾敗北。我不失足的原因，在於對方之不智，而不在我的聰穎，就是因爲考試（尤其日本式的）笨，我才敢藐視它。

不過不管怎麼看不起考試，它在許多國家依然咬住人不放。我估計，我對考試有惡感，跟我近幾年經歷有關係。在中國留學期間，正好逢上「大革命」後期。我在北京和上海學習，福中不知福，還主動提出要求，到「教育化

革命聖地」遼寧省去進修。本想深入了解中國教育革命的三昧，不料除了開門辦學、下去勞動之外，教學方法和內容還比不上狄更斯小說裏孤兒院的家長式教育。

至於考試呢？它那時被扣上十七年黑線專政的帽子，頭都抬不起來。據說對它的虐待並非沒有道理，但這些年來我對種種極端主義的作法（亦包括文革以來的）已有些司空見慣，不欲置評。反正那個時候考試一骨腦兒給「喀嚓」了。因此，我這個討厭伏案急書、絞盡腦汁而考試的人，就頗有如魚得水之感。在那個無考試（亦無教育）的「天堂」泡壞了，去年跟數年不見的仇人重逢，怎能愉快？我一下子從樂園的夢中驚醒，像米爾頓《失樂園》的魯西弗（Lucifer）一樣，跌到地獄去了——是個考試的地獄。一年的日語速成課程，每周上五天課，每天五、六小時，一個星期就要做一次「試驗」（即考試、小測）。經受了日語考試四十幾次的進擊，我對操縱頑敵的幕後人——老師——的心理，就有了一些認識。

不過考試也有好有壞，我對後者特別反感。好的考試可以促進學習，協助師生總結教學效果，我承認。但在評價和考核一個人掌握知識或技能的時候，單憑一次幾個小時的考試，不一定能準確而公正地測定學生的收穫。

日本是一個物質生活相當發達的國家。戰爭以後，麥克阿瑟佔領時期以來，考試就成為日本教育制度和選拔才能的主要途徑。幼童入幼兒園要做智力測驗；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亦都要考試。學生的求知慾強烈。好的公司只選用名牌學校與大學出身的人，因此，名校入學考試的競爭有些殺氣騰騰，要一步步考上去。這就像坐電梯一樣，直線上升。日本老師對考試和學生成績單上的分數非常重視，我的日語老師也不例外，所以我心裏埋藏多年的對考試的不敬之意，去年就油然而生了。

在澳大利亞定期考試考了十個月後，就到東京繼續學習兩個月。我在日本，覺得那些着重形式和成績而無視學生實際收穫的小測更不對味。當老師用年未大考來嚇唬我們的時候，我不禁想到芥川龍之介的作品《蜘蛛絲》。

芥川這個短篇小說，講釋迦牟尼在西天俯視蓮花池，見到在地獄血池針山

受折磨的罪人堪達塔。釋迦大發慈悲，把一根蜘蛛絲放到池底，讓堪達塔沿絲而上。堪達塔握住蜘蛛絲，於是自矇瞓黑暗的地獄慢慢地往上爬。一邊爬，一邊擔心蜘蛛絲撐不住他而斷折，爬到中途，已經可以望到極樂的光芒，突然發現地獄裏跟他一塊受罪的人，也跟着他爬上來。早被釋迦警告不可出聲的堪達塔，生怕絲斷人墜，這時却吆喝下邊的罪人不要上來。說時遲，那時快，蜘蛛絲斷了——堪達塔又掉回血池裏去了。釋迦看到這一切，為堪達塔的自私而嘆息，然後走掉了。

芥川作品裏改寫的舊故事很多。雖然他一般沒有像魯迅在《故事新編》裏有所寄托，但我覺得《蜘蛛絲》這一篇很有教益。如果為了克服考試制度壞的一面（即錦標主義，唯成績論，「同學乃是我敵」等影響），就不應光為自己奮鬥，而把別人視為前進的障礙。不過在像日本的教育制度下，學生之間的競爭和「唯成績論」屬於教學的主要因素。老師雖然盡力培養學生，制度和社會

的改革並不能由他們實現，最後，只好像釋迦一樣，到時嘆口氣，撒手退場而去。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

日本點滴：競爭和「恥」

154

日本是一個競爭異常強烈的社會。雖然個人主義和個人「競爭慾」之盛未必亞於歐美，但有一點不同，日本人亦善於集體競爭。

有人會說，通過一個社會的遊戲和娛樂，可以瞭解那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精髓。日本也不例外。遠的不說，除夕晚上，電視轉播一九八〇年全日本紅歌星大賽，就很可一談。這種一年舉行一次的歌手「大賞」，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常見（可以前幾週舉行的太平洋地區歌唱大賽為例）。不過以男女分隊，同時進行「大我」和「小我」競賽的，恐怕為日本獨有的形式。

紅白比賽不限於歌唱家。前一段時間，我在東京四谷上智大學學習，外國傳教士創辦的這個學府，就很有一點我在中國大學讀書時的氣氛：到處貼着標語；天天在校內小路的交叉路口還有學生嚷嚷，像要獨攬顧客那樣似的宣傳自

己系裏如何如何之好。到了年底，紅白比賽終於大興。比賽項目都跟文藝有關。社會上「忘年會」頻開；而在學校裏，則是讓男男女女文藝隊伍比一比才能。

日本人從小就給灌輸一種與人競賽爭取優勝的思想。從幼兒園「升入」小學時，要跟其他小朋友參加智力考核。慈祥的父母早有準備，給自己心愛的子女壯膽打氣，希望懵懵然進入考場的小孩，能把過去的小同伴看作對手，答考題要棋高一着，能夠上一個「一流」或「名牌」學校。因此，日本的孩子從小就學會為自己為家長奮鬥上進，而視他人為敵方。

跟日本青年朋友打球玩要，等不了多久，他們的競賽症就會發作，非記分判明勝敗不可。本來想藉此鍛煉身體，暫時擺脫書本誘惑和統治的人，剎那間取代鬆弛精神的，竟是殺氣騰騰和躍躍欲試的競爭癖。當然，跟好朋友打球玩，不必認真記分；但同不十分熟悉的人打乒乓球，玩網球之類，就得注意「策略」。人家記分，是為了給自己以精神上的壓力，樹立奮鬥目標，把簡單

的打球提升到一個更高境界。你若以淡漠的態度相對就不好；若輕鬆瀟洒地打了一陣而到最後贏了他，對方更會感到自尊心大傷，這時朋友關係恐怕難以維持下去。上邊講的「策略」，就是要懂得打輸、或留面子的方法。

在激烈的競賽中取得第一名，是值得祝賀與讚賞的。但在日本，你拼命去取勝反而深感懊惱的事也不少見。除夕晚上，日本紅歌星大賽紅隊的八代亞紀女士被選為最佳歌手時，她就激動得流淚哭起來。其原因恐怕不純屬極度興奮導致的休克反應，而跟日本人性格裏內在的「恥」字頗有關係。八代得勝後，不好意思地向參加比賽的歌手鞠躬道歉，她再唱她那首拿手的歌曲時，也流露了她內心的矛盾——欣喜而羞愧。日本人自己說他們的文化是「恥的文化」，我看，要瞭解他們的極其複雜的心理，這個「恥」的概念同表現值得注意。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日）

試評李克曼著《中國的陰影》

漢學者李克曼（Pierre Ryckmans）以西蒙·李斯（Simon Leys）為筆名所寫的《中國的陰影》（Chinese Shadows）一書，最近開始發行英譯平裝本。這本被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卡諾（Stanley Karnow）評為「破除了中國的神秘感」的書，據說將迅速成為今年最暢銷書之一。

李克曼先生原籍比利時，持有法律學及藝術、考古史的博士學位，但他在過去二十年內的主要興趣是研究中國語文和文化，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現任教於澳洲國立大學。一九七二年，李克曼先生作為比利時外交官派駐北京半年，翌年，他再到中國旅遊。據作者在序言中說，《中國的陰影》是根據他個人與中國的這些接觸寫成的。

五十年代，西方對中共的評論與分析多是攻擊性或否定的。加上外來的封

鎮與威脅，中共被迫靠攏蘇聯，在國際上無由獲得它應有的地位。在意識形態上同中國多年的隔閡以及受到長期反華宣傳影響的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大陸產生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感。西方意念中的中國大陸是具有斯大林的蘇聯、希特勒的德國特點的國家，是極權、毫無人性的政權。在這個政權的嚴密控制和支配下，中國龐大的人口變成了麻木不仁的機械式的勞動者。政治活動就是絕對服從命令，文化和精神生活只是純為政治需要而設的附屬品。在這種氣氛下，即使有人想穿過宣傳的重幕，探討中國大陸的真相，畢竟也是極其困難的。

六十年代中後期，「文革」的中國雖然受到更多西方傳播媒介的否定，可是在六十年代末飽受學潮、反越戰運動和嬉皮士思潮衝擊的西方社會，却對中國大陸所發生的巨變更加關注，成為一些西方反現成體制青年的崇拜對象。中蘇關係以互相抨擊激化為武裝衝突後，感到國際勢力的組合已發生根本變化的西方國家，開始重新考慮其對華政策。中共進入聯合國，對西方的初步開放，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標誌着中共國際地位的確立。

七十年代初的大多數西方人士，訪華後紛紛讚美中國大陸沒有社會問題，沒有污染，沒有犯罪，沒有個人主義，沒有……。這些言論多半出於作者對本國弊病的不滿與對中國大陸這個新制度的善意，却不免有流於單純及過份美化之嫌。

正當許多人把中國大陸描繪成世外桃源，林彪倒台不久，「四人幫」勢力上升的時刻，李克曼先生作為外交官到達了中國。熱愛中國文化的他看到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中國的陰影》集中了他對現代中國的觀察與裁決。

此書最發人深省的並不是李克曼先生對中共批判的段落，而是使作者作出這些批判的他，在中國大陸的見聞和個人經歷。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文化多年的學者，作者在中國大陸所看到的文化狀況使他大失所望。他談到中國大陸的書店和出版情況時這樣說：

書店內的佈置已完全改變了。現在的書店設有一個櫃台，把書和讀者隔

開

，活像一個藥店。……擺在架子上的書只有幾十種，但爲了讓人看來架上都是滿滿的，書籍被平擺，看起來活像超級市場架上的沙丁魚或青豆罐頭。當然，擺出來的大部分是毛著作，然後是馬克思主義鼻祖的著作以及斯大林、金日成和霍查全集。兒童漫畫和技術性書籍也很多。此外呢？作爲世界上最姿多采、最豐富和歷史最悠久的文學寶庫之一的中國文學，幾乎全數被清除了。當你想到，在中國的首都竟然找不到像《唐詩三百首》這樣一本基本和普及的文學作品時，你會感到極其憤慨。到國家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找遍了藏書目錄，而發覺所有不符合毛氏正統性的二十世紀文學與歷史作品已不翼而飛時，這種憤慨不期然轉變爲極大的恐懼。（《中國的陰影》，一三六頁，Penguin平裝版，下同）

作者談及「樣板戲」時說：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所有的傳統劇目都消失了。現在我們只能看到六種「革命現代樣板戲」。這個有藝術感、有深度、迷於戲劇、一度支配着世上最豐富的戲劇寶庫的人民，七年多以來，被限於觀看毛夫人所指定的六種無聊的兒童木偶式的表演。這些戲劇唯一的「革命」特色僅是組織幾排持槍和舉旗的人民解放軍，在沉悶的低級色士風式的音樂伴奏下在舞台上操來操去而已。（一四三頁）

李克曼的帶有強烈諷刺的文筆有力地描繪出當時中共文藝的表面狀況，可是他過份的悲觀阻礙了他進一步探討現代京劇在舞蹈和唱段方面的成就。

至於教育方面，當了十幾年教師的李克曼有這樣的分析：

文化革命所帶來的最有建設性的創造是在體力勞動方面。各學校有自己耕種的地，自己的小型工廠。學生要在這種工廠裏學會如何操作機器，並參加周

期性的田間勞動。考試制度沒有太大的改變。中國的教學方法一如以往，是極其保守和傳統式的。我參觀上課情形時，總是看見一個習慣性的、教條的、命令性的教授，面對着一羣被動、畢恭畢敬、默然地坐着聽課的學生。（一四七頁）

李克曼對文革後中國大陸教育中流行的極左思潮的描述也相當深刻：

文化革命不是說，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所建的橋比工程師所建的橋還要好嗎？不是說，農村醫療好過醫生主治的醫療嗎？難怪大學教育的價值在人民的眼裏被貶低了。「教育無用論」以及其他一些口號如此流行，以致黨的喉舌不時公開批判它們。學生離開田間、工廠去上大學，畢業後又回到原單位去。如果目的就是回到原單位的話，為什麼「繞這個（上大學的）圈子」呢？（一五六頁）

作為一個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李克曼先生一項最大的失望以至憤慨，源於他在北京生活時，所感到的被隔離感。花費了十幾年時間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精神生活，而且由於當時的局勢，更不能按他的願望同一般的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來往。外交官的身份把他嚴密地拘束在一個由雙方政府協定的範圍內活動。他說：

當局竭力阻止中國人以慣有的單純與熱情接待外國人。現在中國人只能偷偷地、隱蔽地與外國人接觸。（在中國的）外國人始終處於一個虛假的地位。在他的周圍，他所聽到的是熟悉的中文，看到的是熟悉的中國人的臉龐和舉止，使他夢想着在此可以找到他真正的歸宿。然而，他所碰到的只是一道道緊閉着的門，連一般人生活中最簡單的一面，他也無法參與。……他想跟其他人

一樣坐公共汽車嗎？他擠上車後，必定會引起一場風波。售票員叫乘客給外賓讓座。不管是什麼人都可能被叫起來：老頭、孕婦、殘廢者——最重要的是不能讓外賓繼續站着。……到處都一樣。總有一個無形的、無處不在的、萬能的有關方面派來的下級官員，在這個無助的外國人與一般人之間建立起一道無法踰越的鴻溝。（廿二至廿三頁）

李克曼對四人幫政治實用主義思潮影響下的中共幹部作了尖銳的批評：

對中國的命運來講，哪個更重要：上頭幾個人高瞻遠矚的智慧，還是一個抹煞創造性的愚蠢官僚機器？在這個無聊、教條、平庸、傲慢、神經過敏、墨守成規、恐懼主動性的官僚機器的支配下，最上頭的遠見無法完整地傳達到基層……中下級幹部的鉛斗蓬重重地壓在人民的肩膀上，壓抑了人民的創造才華，窒息了人民傳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一九七至一九八頁）

李克曼的這段話有全盤否定之嫌，然而，他的確指出了當時中下級幹部的一些嚴重問題。可惜的是，李克曼如此深刻的觀察，往往被他的過份情緒化反應和表面、洩憤性的議論所影響，而損害了他的批評中客觀的一面。

在李克曼優美的文筆下，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一些真實情況，在此書中得到了風趣的、有時甚至深刻的寫照。對於想了解當時中國的人，本書有讀一讀的價值。不過，作者的主觀片面性畢竟嚴重損害了他這部作品的價值。由於中國大陸當時特殊的政治風氣，和李克曼的外交官身份，作者在中國大陸無法接觸到一般人的實際生活，因而對長期存在於中共體制、社會內的很多極其複雜、微妙的政治、經濟、甚至封建因素無從知悉。對文革前的中國大陸，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近代中國缺乏了解的作者，只能夠在理論上或者借他人的話語來衡量中共和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功過。作者在前言聲明，他寫此書的目的僅在「奉上愚者之一得以補智者之一失」。而確實那些所謂的「中國的朋友」

友」所講並非都是誠實的真話。近幾年來，在這類人士中普遍存在的隨風轉舵，恐怕已經足夠貶低他們的言論的實際價值了。問題是，李克曼雖然不是這個隊伍裏的人，但却在《中國的陰影》一書裏同樣地犯了只憑個人的一些觀察，即下斷語的毛病。

李克曼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淵博知識，他對中國文化、歷史的熱愛，使他對未曾接觸過的中國大陸人民產生了一種理想化、抽象化的留戀。因此，他在書裏往往把他所抨擊和怨恨的對象，不論是毛澤東也好，中共也好，文革也好，和億萬中國老百姓對立起來。羣衆在他的眼裏始終是純潔、偉大、完美的，政治是漠不關心的，對中共和毛澤東懷着厭煩和唾棄的慾望。中國大陸的一切弊病、落後、愚昧等等統統歸咎於中共的領導。對任何一個稍微熟悉中國自三十年代以來的變化，對中國大陸上嚴重影響人民生活、思想的封建意識，對了解到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巨大經濟差距的人來說，李克曼先生在這方面的單純和淺陋只能令人嘆息而已。

李克曼先生所接觸到的中國是一個已經跌入黑暗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統治的中國。但李克曼先生爲了維護他所心愛的文化，却把由於傳統意識的影響所導致的中共和毛澤東的錯誤，同中國大陸當時的一些改善與進展混爲一談，並因爲這些錯誤而否定所有進展。這也是極其失當的。

李克曼在該書最後一頁說：

如果毛氏的官僚……敢讓我們（外國人）真正地和（中國）人民一起生活，我不相信我會得到像在這本書裏所寫的那麼多反面的印象。這並不是說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是那麼舒適——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但它的無窮的人海一定能把此書裏的無情嘲諷滌蕩乾淨。（二一一頁）

這一點倒不只是李克曼先生個人的願望。

（一九七八年八月）

附

丁玲與「一本書主義」

六月間到北京探望朋友時，很慶幸有機會見到中國著名女作家丁玲。在外國，丁玲可算為「知名度」最高的中國女作家。近十幾年歐美出現婦女解放運動以來，不少人翻開中國近代文學史，看中了兩名女作家，認為她們比較能夠代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進步婦女：一位是晚清的秋瑾，另一位就是丁玲。當然在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的一些專家們看來，可能有異議，不過她們畢竟在國外是較有影響力的。

六月十一日下午，我跟幾位朋友到北京西郊的友誼賓館去找丁玲。丁玲和她丈夫陳明暫時住在那裏（後來發現，陽翰笙先生也就住在丁玲對面）。

我們那天就從下午三時一直談到六點。兩位好客的主人硬留我們吃完晚飯再走。沒料到，晚飯吃完就在賓館大花園裏散步，以後又上樓談到八點多鐘。

因為第一天只談了一九五六年以後的事，我們就說好第二天下午還要去談。通過兩次長達十小時的談話，我們對丁玲的純樸和誠摯，有極其深刻的印象。

談及一九五六年丁玲被打成「反黨集團」頭頭時，我就問起關於當時批判她「一本書主義」的詳情。這時丁玲笑起來了，她說：「啊，人人別的不提，只記得丁玲的『一本書主義』」。甚至現在給她寫信的讀者，也有些人以讚許的筆調提及丁玲的老「罪狀」。她說「一本書主義」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有一次，她請了一些青年朋友和文藝愛好者到她家去作客，在談笑中她就拿出了幾本印製較精緻的書，給在座的人看。其中有普希金著作的精裝本，也有些插圖很漂亮的書。他們在翻看這些書時，丁玲隨便說了一句：「如果一個作者能寫一本像這樣的東西，那就好了。」沒想到在批判丁玲反黨言論時，那天在她家裏作客的一個人，在批判會上提到丁玲鼓吹「一本書主義」的事情。從此以訛傳訛，丁玲隨口所講的一句話，就成為一個駭人聽聞的「主義」。接着，報紙上也有文章，批判丁玲如何鼓勵作者，以寫作追求名譽和地位，如何想向人

民要錢，如何腐蝕青年作者思想，如此云云。現在看起來，那些「批判文章」和十年後的「四人幫」「革命文藝批判文章」，確實是如出一轍。反正從「一本書主義」見報以後，聽到丁玲這個名字的人往往不免想到那個令人費解的「一本書主義」。

現在丁玲終於獲得平反，以前對她的錯誤批判和不實之詞也被推倒。現在我們只希望，以真話和較多的時間，把過去的污垢和渣滓洗滌淨盡。

（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

丁玲談養鷄的故事

跟老作家丁玲見面聊天的人很快會發現，這位在鄉下勞動、工作將近二十年的老知識分子，熱衷於談有關養鷄的事。問起這位老作家怎麼對養鷄感興趣，她就不憚煩地講她如何跟鷄隻開始「打交道」。

一九五八年丁玲被分配到黑龍江國營農場去「深入生活」，她一下去就向地委提出要參加勞動的要求。地委的負責人認為，這位當時年近花甲的丁玲不適宜參加那些體力強度太大的勞動，但最後批准她到農場的畜牧場幹活。鷄場並非什麼田園式的小場地，而是一個相當有規模，擁有二十萬隻鷄的大畜牧場。丁玲剛搬到場裏在鷄棚旁邊的小房子時，對她的「工作對象」頗為害怕，但敬而遠之的反應，因為工作的需要和丁玲本身的毅力，很快就消除了。不久丁玲就對鷄發生了深厚的興趣，對鷄的分類，什麼九斤黃、澳洲黑等等，沒用多

少時間就很熟悉。

可能是因為她過去的個人經歷，或她自小的情緒傾向，丁玲在養鷄場最願意撫養病鷄和弱鷄。結果，雖然她首先養了一段時間良種鷄（甚至有一次她帶了一個人到丹江市自己掏腰包買良種鷄），不久她就把弱小和不健康的小鷄都集中在她身邊來調理。她說自己「小氣」，弱鷄雖可賣或埋掉不管，她還是硬要養。最後她連隊裏的支部書記都給說動了。從此，丁玲專門去找隊裏所有的病鷄，把小的都放在自己熱炕上去養，把好的壞的、有傳染病的都分開。鷄所吃的食料和藥，都是丁玲自己調配的。場裏其他人休息，或有人來替換，丁玲還是一个人在屋裏忙着養好小病鷄。養病鷄平均百分之八十成功，一批鷄治好能下蛋就換另一批來養。丁玲養鷄所用的屋子，也就是她自己的屋子，乾淨得被隊裏評比時受到表揚。

丁玲這段時間養鷄的經歷，使她對農場的生活和生產發生一種迷戀的情感。十幾年後她在文化革命中被關進北京秦城監獄單人房時，經常回憶起她在

北大荒養鷄和參加勞動，跟農民一起生活的情景。爲了打發時光，減少囚房的沉悶，丁玲以紙屑和不同顏色的紙片做成小模型或以之代表房子、牲口等等，在她床鋪上「擺陣」，弄她理想中的農場。

時間已過了好幾年。丁玲不再是北大荒的「老右派」，也不再受冷遇。但雖然丁玲已經回到北京，也天天有各界人士去看望她，她還是不時地回想起她在東北和山西的生活。她說她已經住慣了鄉下，希望在北京的事情安排好了之後還可以回山西農村去住。雖然她可能沒有時間辦一個農場或一個養鷄場，但若有機會的話，就一定可以寫出很多關於她養鷄的故事和體會，甚至也有足夠權威撰寫一本關於養鷄知識的專著。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丁玲漫話二十年遭遇

一九七九年六月初到北京西郊的友誼賓館拜訪丁玲時，發現她是一個跟我原來想像完全不同的人。到門口來迎我進屋的是一位樸實和氣的「老大娘」。這就是丁玲？！她好像是剛剛從農村來的慈祥的老大娘。二十餘年在鄉下的簡樸生活，把丁玲的相貌變得像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過鄉村的人了。但坐下聊起來時，就發現丁玲的明快眼神和笑聲却跟她的年歲和慘痛經歷不符。她還是有着沈從文在《記丁玲》裏所說的那種「天真爛漫」氣質。

養鷄醫生

一九五七年，丁玲在被打成「反黨集團」頭目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並不在北京。一九五三、五四年她在外地深入生活寫散文，回到北京後幾天，她就發

現批判的矛頭指的不是別人而就是她本人。當「不接受黨的監督」、「違抗黨的領導」、「組織反黨集團」等等大罪名壓下來時，丁玲的主要反應是要想辦法保留黨籍。她說，自三十年代起的二十多年裏，對她的思想、生活和創作最有影響力和指導作用的是共產黨，共產黨是她所離不開的。首先她竭力反駁批判她的人，辯駁那些批判者所捏造的種種罪名，但她這樣做只給他們以可乘之機，說她態度頑抗，並以此作爲她的新的罪狀。後來，丁玲想最好承認一些錯誤，挨一下批判就到外地去寫東西算了。經過將近兩年的批判和審查，她終於在一九五八年獲准下放「體驗生活，進行創作」（丁帶到北大荒的王震的介紹信語）。

一九五八年春夏間，丁玲離開北京到黑龍江湯元縣的一個國營農場去生活。她本來以爲要下去幾年，深入生活搜集材料後回北京繼續創作。她和丈夫陳明所在農場的其他右派分子，都是國務院系統的人。當時王震介紹丁玲到佳木斯地區，要地委安排住房和工作。但因爲已經幾年沒發工資，丁玲只靠稿費

生活，到北大荒時就沒有收入了。王震曾鼓勵丁玲把錢都花光，一身清白地接受教育。但他沒法知道丁玲的下放跟以往的幹部下放情況不同，並非暫時性的。丁就用錢買發電機和其他農機設備捐給她所在的大隊。頭幾年是用她以前積蓄的稿費，後來用完了，就只好靠陳明的工資過日子。到文化革命被「揪鬥」時，她才獲政府發的每月十五元人民幣生活費。

丁玲下鄉之後很認真，向地委要求安排工作，要跟當地的羣衆打成一片。雖然她本來就沒有完全同意對她的批判和對她的工作的全盤否定，既然下去「勞改」，體驗生活，她就要真心誠意地要求參加勞動。不久，領導分配她到養鷄場去工作。

掃盲教員

一九五九年，她養了一年鷄以後，王震又同意她調換工作。從那時候開始，她在畜牧場當文化教員。很快她就擔任了文化、娛樂和政治學習的負責

人。她也給二十幾歲的隊長當通訊員，幫助黨支部書記起草報告，了解情況，組織各種各樣的娛樂和學習節目（這位隊長由於讓丁玲做了這一類工作，文革時就因「庇護反黨分子」而受到批判）。丁玲在隊裏不但充當文體活動的組織者，亦經常是帶頭幹的積極分子，她領導婦女參加乒乓、球賽，佈置俱樂部，出版黑板報。結果她學會寫美術字、繪畫和設計。一九五七年掃除文盲運動中，她又教掃盲班，高、中、低班都得教，教材也是她自己編的。半年後，因為她教的掃盲班成績突出，地方政府要發獎表揚，但當知道「標兵班」的教員是個著名右派分子，只得把獎發給了另一個生產隊。

丁玲當了六年教員，其中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因為糧食少，吃不好，誰也沒有情緒好好地上課，她就改變了教學方法。每天中午吃完飯，她給大家講故事，通過故事講一些道理和知識。故事講得很吸引人，連大隊黨支書都跑來聽。此外，丁玲還在村裏排戲，她最喜歡排在延安時期愛上的秧歌舞。搞戲劇，排戲時，陳明這位戰地服務團成員和電影專家就能發揮他的專長了。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丁玲在文壇上只有過一次公開露面的機會，即一九六〇年出席全國文代會。她這時已經名譽掃地，但在北大荒農場的羣衆眼裏，她的威望却愈來愈高。在農場頭幾年，一些較有地位的人都對她有成見，甚至經常給她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但離奇的「罪名」一出籠，不少朋友就很快會把這些傳到她的耳朵裏。有一年春節，醫院的幾個病人因為好奇走訪了丁玲的住處，後來被黨支書知道了，他就動員一些人寫大字報，貼到了丁玲的門口，質問他們「跟右派分子握手是什麼立場？」丁玲把這一切冷遇和打擊當作一種考驗和教育，不跟那些人計較。

在鄉下住了幾年之後，丁玲的理想是不再跟文壇有什麼關係了。她時常夢想當一個「養鷄隊隊長」。空閑時間還用牙膏盒的紙片設計了一個養鷄場。此外，她當時也幫助很多人寫家史和「憶苦思甜」材料，發表的時候從不署她的名字。這些材料她曾想寫成書，但「文革」時都給抄走了。農忙時，因為她身體不太好，就在隊裏當會計。

在「害怕的日子」裏

文化革命給丁玲和她的家人帶來了新的痛苦。這些日子對她來說是「害怕的日子」。她的家隨時都可以被人闖進來抄查，先後不下幾十次之多。就是在一次抄家中，她幾年辛勤勞動的結果，十幾萬字的《嚴寒的日子》手稿（《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續篇）被抄走毀掉了。丁玲和她的丈夫提心吊胆地過着每一天日子。

文革初期，丁玲已經搬到寶泉嶺，離她原來下放的湯元有幾百里遠。一九六七一年，突然湯元來了一輛吉普車，要揪丁玲回湯元挨鬥。這些綁架她的人說是要在批鬥湯元農場的黨書記會上讓她「陪鬥」，但實際上，這是湯元的老朋友怕丁玲在寶泉嶺受折磨，把她「揪」到湯元保護起來，這些揪鬥她的「紅衛兵」都是她以前的「學生」，她甚至跟他們的母親都很熟悉。寶泉嶺的人來批鬥她時，湯元的看守不准他們打她，還私下對她說：「你放心在湯元。」

他們要丁玲留在湯元「候門」，但她沒有了解他們的用意，就又堅持回寶泉嶺去了。

在寶泉嶺，丁玲雖然是「專政對象」，但她還是願意接觸羣衆，開始做家屬工作。主要是組織大家學習毛澤東的著作，看護孩子和照顧老人，看護病人，為產婦助產。她當時也搞婦女工作，組織婦聯的人學習，講故事。後來，寶泉開批鬥會時也總會有人保護她，路上有人給她當「保鏢」，原來他們就是這些婦女的孩子。但儘管如此，丁玲還是不能完全避免挨打。有一次批鬥剛結束走下台時，有一個紅衛兵踢了她一脚，她就摔倒在地上，腳摔壞了。回家的路上還有一羣人一路拳打腳踢。一九六八年她被關進牛棚，一個人在牛棚裏待了十個月，因為營養不良，她患上了夜盲症。

在十分苦悶的時候，丁玲往往回憶起她和陳明在湯元時的情景。她覺得那幾年的生還頗有趣味，到河邊去洗衣服，冬日雪夜裏，看完了電影跟陳明走路回家，沒有別人，只有雪白的夜景，她覺得挺羅曼蒂克，是住大城市的人所

體驗不到的。她的樂觀態度和堅強意志給她勇氣和力量，使她活下去。她說當時她就是想一定要活下去，必得活下去。從牛棚出來就受羣衆的監督，跟幾個北京來的下鄉知青住在一起。她們對這個大右派相當憎恨，強迫她長時間的勞動，倒尿盆，掃地，晚上還要搓麻繩。丁玲開始時很不服氣，後來覺得她們恨她是很自然的事情，只好忍耐，慢慢那些女青年的態度也有了變化，好的時候把她看為一個老媽子，不好時就是反革命分子、特務、壞人。

「來救命了」

一九七〇年，「中央文革小組」下令把丁玲押回北京坐牢。當時丁並沒有把這看作是懲罰，而心裏高興地想「來救命了」。關在牢裏，外邊人起碼不能隨便闖進囚房來。就這樣，丁玲在北京西山的秦城一號高級政治監獄裏坐了五年單人房。除了偶爾的審問，她在囚房裏可以看書（第一年看了四本毛澤東選集、報紙和紅旗雜誌，林彪事件後就看了幹部必讀的六本馬列的書，後來又把

馬恩列斯全集看了一遍）。雖然陳明是同一時期關進監牢的，丁玲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們的監號只差一個號碼，但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他們獲釋到山西去勞動時，才重新見了面。丁玲的監獄生活還比較舒服，飯菜營養豐富，環境清靜，看守都是年輕的解放軍戰士，也比較善良。丁玲說：「我把他們當作延安時代的紅小鬼。」

關進監獄與世隔絕，畢竟是件令人難堪的遭遇，所以丁得知要放她出去到山西養老（還給她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費！）就很高興。她和陳明在山西長治的嶂頭大隊起了房子住下了。當地的老百姓對這一對老「反革命」很好奇，經常到她家裏去坐，後來竟然弄得她苦於接待來訪者。羣衆問她的身份時，因為怕他們刨根問底，所以也不敢以實相告。生活安定下來之後，丁玲又重新開始寫作了，先把前幾年毀掉的《嚴寒的日子》再從頭寫起。當後來羣衆知道她就是丁玲時，很快就有來請她替他們寫告狀信，她就又有點「文員」的工作做。

丁玲說，她在山西生活得較安寧，直到一九七六年周恩來總理去世。當時

丁很悲痛，也很不放心，因為她知道唯一替她說話的人去世了，她自己的生死也就難卜了。她在家裏設了個小小的靈堂，把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會上的悼詞貼到牆上。

四人幫下台後，去年不僅摘了壓在她頭上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如今，一九五六年的案件也完全解決了，錯誤的結論取消了，她獲得了正式平反。

「我不是反對黨，是提意見」

丁玲是一位異常堅強的女性。二十餘年的艱苦磨難，她沒有喪失信心，經過了無數次考驗，她對周圍的人仍然保持着虛心誠摯的態度。丁玲說她很了解舊中國的實質，也深知共產黨在她一生中的關鍵作用。她不同意人們說她是共產黨作家裏早期的離心分子。她說她是對一些事情有過意見，為此，也在她的一些作品裏提出過批評，甚至對某些人也有過看法，但她並沒有反黨，沒有分裂黨的思想或行為。國外有人把她和一些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其他老

作家跟蘇聯的「離心作家」相提並論，丁玲說這樣看問題的人對中國作家在舊中國的遭遇太不理解，對中國左翼作家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感情和依賴也是很不理解的。

對在四十年代初她寫的文章，如《在醫院中》和《三八節有感》，丁玲說：「雖然這些作品有消極的東西，但也有積極的東西」，當時儘管是挨了點批評，很多其他人也受了批評。丁笑着說光看當時發表的文章，說這些東西好，恐怕太簡單化了一點。當時在延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數衆多，白區對解放區壓力很大，所以最需要的還是團結。結果黨對一些思想傾向進行批判。寫批評延安和黨的文章的人很多，但受批判的是丁和其他人。文藝界進行整頓時，丁玲還當學習委員會主任，根本沒有抓起來「改造」。當時的運動是內部批評，毛澤東做了一個總結性的講話，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丁玲說，這個講話內容很多，涉及面廣泛，從發表以來就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這些解釋不同就產生了很多問題。

在談論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藝界時，又談及王實味和他的《野百合花》，丁玲說《野百合花》的內容還是和其他的作品類似，較寫實。王實味是別人介紹給她認識的，丁自己跟王來往不多。雖然後來查明王在上海有個托派朋友，但丁玲以為這恐怕不足以把王也說成是托派分子。王三十年代在上海時也跟創造社有來往。王到延安後，就到馬列主義研究室工作。批評王時主要是思想認識問題，並不作爲政治鬥爭。王在一九四四年見外國記者是丁玲負責安排的。撤離延安時保安處沒有請示就把王給槍斃了，毛澤東主席對這件事很不高興。

丁玲說當時的文藝批評是爲了統一思想，團結力量以便參加戰鬥。後來文藝批評和政治鬥爭之間的界線沖掉了。現在恰好相反，文藝批評太少了。很多低級的外國電影和香港影片在大城市裏放映，放映前不展開適當的宣傳，放映後也不總結，這樣毫無分析或批評地放電影是不好的。有些香港的電影是三十一年代東西的翻版，一點不加以評價的話，幾十年的文藝運動一下子就白搞了。

我在丁玲的書桌上看到了一本《傷痕》。問丁她對這種新的文學——傷痕

文學的看法。她說看得還不多。因為這些作家還沒有發表很多東西，所以看一兩篇就很難說一個作家怎麼樣。他們還需要時間，要有更多的作品。如果他們（這些作者）以前在底下真正深入生活，現在就可以寫出好東西。反正這些年青作者敢說話，年青人沒經過那麼多曲折。我們老人已習慣了不要隨便說話，

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寫。丁說她自己不想寫傷感的作品，她要寫比較樂觀而積極的東西。如果誰都寫「傷痕」作品，讀者都會垂頭喪氣沒有精神去生活。她說別看我以前寫了一個《莎菲女士日記》，那是二十年代的作品，是當時我精神苦悶的產物。但那是二十年代，不是五十、六十或者七十年代，丁不贊成莎菲這種人，她自己也不是一個莎菲，但當時的確有這種人。

最後談到關於以前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在現在文壇的影響。我這樣突然問起這個問題丁首先好像有點吃驚，過一會她就笑了一下說，以前的事情很多，如果願意繼續算舊賬的話那就沒完沒了。但現在中國是這麼個亂攏子，問題又那麼多，繼續對一些個人之間的分歧糾纏不放，中國就沒有希望。丁說她自己沒

有興趣搞這些東西，在這點上也希望其他人向前看。反正她自己還是很樂觀。現在黨已經承認了錯誤，正在糾正二十年來的許多多錯案。這是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的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為黨給她平反，恢復黨籍，丁玲就非常受感動，覺得有了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中國才有希望。

丁玲離開中國文壇已經有二十多年，但她對過去和現在還是相當了解。二十年來的天翻地覆的政治運動中她也有一份，不是當參加者而是當鬥爭的對象。她對中國社會的實質通過一輩子的參與和觀察，了解得很深。她現在除了寫有關在北大荒生活中所接觸的人物的一些作品，也在研究二十年代以來她自己創作生涯裏的若干問題。她也在總結經驗，準備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和發展作出貢獻。

（一九七九年八月）

先生「古」酒人

酒這玩意在許多國家歷史上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人說，酒在歷史上作用非常之大。是否如此，得等史學家們發表專著討論。但我自己印象中，酒的確是蠻厲害的。記得中學讀古代史，讀到羅馬帝國之衰亡時，課堂還有人提出羅馬帝國「飲酒亡國」論。雖然老師沒同意，歷史教材和史料沒有把飲酒列為羅馬帝國亡國的原因之一，但恐怕還是有不少人相信，羅馬人（即現在所謂「拉丁人」老祖宗）因過分地崇拜酒神巴克斯（Bacchus），而導致其社會之腐敗解體和帝國之崩潰。

酒在中國歷史上亦有相當地位。從中國文學史看，可說酒是一個產生文藝作品的重要促進劑。關於酒與文學和文人的美談，多得簡直不勝枚舉。前幾天看到《大公園》的《漢學家與「小狗」》一文之後，似乎覺得中國文人和酒的

美談還在不斷產生哩。

那篇文章說，翻譯家楊憲益「曾以劉伶之徒的身份，開玩笑地說過：他是『活到老，喝到老。』」這就引起我回想兩個月前在北京楊憲益家裏玩的鏡頭（的確是「吃喝玩樂」！）。楊憲益和他夫人戴乃迭，那天正好看了在故宮展出的《中山國出土文物展覽》。旁的沒談，憲益就加油加醋地講起那裏展出的古酒。我看，他差點口水沒流到那罐古酒上。他倆的確不想再看別的。憲益當場就提出親口品嘗古酒味道的要求。當然，目的在於進一步研究古酒的成份和味道，此外恐怕可能也有點「私心雜念」吧？反正他說過，把好好的幾罐酒陳列出來是太大的浪費，把它喝光了多乾淨。喝一喝中國最古老的酒應該是所有「酒人」的奢望之一。

結果不出意外，古酒沒喝成，他只好口乾乾地回家。到了晚上自己打開一瓶「五糧液」，同幾個朋友痛飲一番。雖然「中山酒」沒喝成，但他對酒的酷愛，不愧為現代中國文人的飲酒美談之一。外國到處有歌星和明星，甚至十年

前耶穌基督在美國的現代化歌曲裏竟被稱爲「超級巨星」(superstar)，我在北京接觸了像楊憲益這種繼承中國文人飲酒傳統的人，忽然想到一個新的詞彙：中國的一個「酒星」。

註：魯迅《哀范君三首》（一九一二年）有「把酒問當世，先生小酒人」之句。范君指范愛農，是魯迅早期的好友。本題借用此意。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

耳目一新之作——談巴金《隨想錄》

巴金先生的《隨想錄》由香港三聯書店印行成書，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平時在《大公報》看巴金這些作品的人，無疑會因爲現在有這本書而感到高興。但這只是對有「巴金癮」的人的一種方便，跟我想談的《隨想錄》出書的意義不同。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巴金的書和我對中國及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有分不開的聯繫。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習中文不到一年半，就厭於課程內容枯燥，請老師介紹一本語言不太難懂但比較可讀的中文書。老師推薦的就是巴金的《家》。儘管我當時的中文水平很低，我還是硬着頭皮，在幾週的時間內，把全書似懂非懂地讀完了。我始終覺得，我能夠把這本中國現代文學經典作品讀完的原因，與巴金文筆的簡練和內容的坦誠有關。書的本身就在吸引我，雖

然那幾個星期字典和筆記本是我唯一的可靠伙伴，我並沒有感到煩惱。讀完了《家》，反而覺得它沒使我失望，只是我因為中文太差而虧待了一位遠居中國的誠摯作家。

後來我就讀了巴金的小說集和全集裏的許多作品。魯迅確為中國三十年代文豪，但巴金的一些作品，以樸素的文風把當時的情景寫出來，也是十分感動人的。不過等我讀到巴金在五十年代寫的幾篇作品，就感覺到文藝作品「愈走愈窄」的可怖陰影。從那個時候起，我很長時間再沒有讀巴金作品。

一九七四年年底我以一個交換留學生的身份到中國去讀書。很快就被「分配」到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讀現代和當代文學的進修課程。在那些「越進越『修』」的日子裏，我們上課的內容基本上只有兩項。第一項是「光有旗手沒有兵」的現代文學作家——魯迅。第二呢？不言而喻，乃是看不厭、聽不厭和唱不厭的樣板戲。此外，經常有一些開門辦學的活動。其實我們留學生當時如果沒有機會「帶任務」走上社會，就很難保持精神上的平衡。

「開門辦學」的時候，我們這些自腐朽資本主義國家來的學生，偶爾也會有機會，對以後實施「請進來辦學」的計劃，向領導提出意見。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除了神化得可憐的魯迅之外，沒有機會瞭解三十年代上海其他文學家的困難。談得雙方甚至有點面紅耳赤。大部分同學埋怨說，在本國放棄學業或工作，來中國學習或做點研究，結果什麼都做不成。連想從圖書館借一本沒經過「欽定」的書都不行。因為有同學知道巴金先生還在（但沒人願意肯定），我們就向校方提出要求，請巴金先生來復旦舉行座談會。雖然校方說「不便安排」（這些人連直截了當地拒絕的膽子也沒有），我們還是聽到關於巴金的若干消息。他還活着，我們很高興。

現在想起這些，跟回憶一場夢一樣。中國在這幾年的變化非常大。近兩年來，文壇的「大罪人」——丁玲、艾青、蕭三，連胡風都出來了，何況像巴金這樣的作家？中國文壇「劫後重生」，長時間談不得的問題有人在談在爭論。有個人在做各種試驗，各種文學作品在出現了。這情形同幾年前的慘狀無法相比。

「四人幫」倒台後，文藝界出現了不少大膽的作品。不管是「傷痕文學」，「潮頭文學」或更新的「干預生活寫實文學」，都是前幾年想像不到的。至於這些新流派的文學價值和社會作用，恐怕尚需很好研究。無論最後怎麼看待這些文藝現象，現在中國的作家確有很多人是在探討社會、揭示社會和評論社會。這種探討的精神就非常可貴。文壇出現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值得讚揚的，不過我自己認為這類作品最有感染力，最能夠反映並代表這個時代。

新文學作品裏，有的比五十年代的作品還要大膽還要解放。這些自「達摩克里斯劍」下倖免於難的作家，有的以新作品奪回過去的讀者，有的秉筆直書，向社會的弊端衝去；有的僅以自我表現為理由，創作自己樂意創作的作品。看樣子，以作家的犀利解剖刀在社會的腐爛和受傷處開刀的人，較受歡迎。這不足為奇。不過我認為，以同樣不留情的解剖刀，在自己身上解剖起來的作家，是更值得敬佩讚揚的。讀巴金先生的《隨想錄》就深深感到這位老作家又在用他那樸直而深摯的文筆，來分析和研討他自己及其所處的社會。他寫出

來的作品並非應時應景的小品，而是一個跨過幾個世代的人對歷史對自己對社會的見證。

希望更多人讀一讀《隨想錄》，因為從這裏看到的不是巴金一個人；這比看那些通過虛構的人物、情節和語言來反映他們理想中社會的作品，更深刻，更真實而且更感人。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談出國訪問

近來中國出國訪問的代表團，空前之多。絡繹不絕的出訪，大有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初年岩倉具視率巨團到外國考察之勢。中國多派團體出國瞭解外邊的情況，很必要，但數量之多，難以保證質量之高。因為被選派人員，有時對訪問的目的和價值不清楚，就很難訪問出什麼結果。甚至因為個別人趁現在的中國「出國熱」，濫竽充數到外國跑一趟，不但不能滿載而歸，反而在被訪問的國家留下某些不良印象。

我雖然接觸了不少出國訪問的中國代表團，但發現他們並不都是真正懂得與國外交往的人。比如，前一段時間，有一個與婦女問題有關的中國代表團來澳大利亞訪問。在一個婦女專題討論會上，有人問：「當前西方各國婦女還常有被強姦、非禮和歧視之虞。在中國，這個情況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的

人，講了一通解放以後在黨和毛主席的關懷下，中國婦女就頂上半邊天等話以後，就聲稱中國婦女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社會問題。我覺得，在專家和「有識之士」面前講話，非同兒戲。聽的人當中，就有不少去過中國或比較瞭解中國近幾年來社會問題的人。聽完了這個回答，有人就不免覺得，多看看《北京周報》也許就夠了。

我舉這個例子，用意並非抨擊那位善意的代表團團員，問題在於：沒有充分準備，或僅為完成一項商定的互訪計劃而出國訪問，未必於加深雙方瞭解、加強友誼有很大貢獻。以中國文化革命時期的眼光，看待當前中國內部的問題，已完全不符合現實。在中國國內，這總還可以進行說服教育，把錯誤的觀點改過來。不過在國外，「文革」時期的那一套懼外、愚民意識若繼續保留，在外國人面前搞「中國不可知」、「中國不可與外國比」的「神秘主義」宣傳，那就很不好。

前面講這些憤激的話，只是為了作個陪襯。不久前，澳大利亞作家協會邀

請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在南澳阿德萊德藝術節期間舉行的國際作家週。

因為這個「作協」比較不喜歡翻譯（嫌它妨礙作者之間的交談），就想請幾位會講英文的中國作家來。甚出意料之外，請到了著名翻譯家夫婦楊憲益和戴乃迭。團裏還有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兼翻譯家王佐良和江西省「文聯」主席俞林。雖然二位不如「楊家將」在國外有名：在澳大利亞，有人說他倆是「活着的傳說」——(Living Legend)，但經幾週的訪問，本地人發現王、俞二氏亦非平凡之輩。

這個中國作家代表團雖然成員只有四個人，「友好船」或購買外國技術設備調查團要比它大幾倍幾十倍，但自口碑來看，這個小團體的訪問，給人印象很好，很深刻。要尋出原因來也不難。這四個人經過十幾年的精神折磨，又警惕於中國長期犯的「浮誇症」，非常珍惜講老實話，他們也深知外國一些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在為真誠地求實地表現自己和社會而工作，因為他們有這種認識，很容易對其他作家一視同仁，講出心裏話來。

在坎培拉，我有機會同這個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起活動幾天。有一天下午楊憲益和俞林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學院，就中國當前學術和文藝界狀況講演。俞林因長期沒用英文交談，就請我當翻譯。在兩個多小時的講話中，這兩位解答了許多國外學者所關心的問題。連認為「中共」代表團無不是政策喉舌的人，也覺得這次講話甚為有益。楊憲益滿腹經綸，但我覺得更叫人佩服的是他的爲人。學問淵博的人不多；但誠摯而富於人情味的學術界名人更少。楊的非凡經歷予他以幽默感和深刻的人生理解。他和他同樣令人敬佩的夫人戴乃迭，就在澳大利亞對依然籠罩在神祕幔幕後的中國，說話了，說實了。在虛實仍然激烈相爭的今天，這樣做很不容易。

幾十年來，中國的情況常有反覆。但在國外，很多人對於中國的瞭解，似乎是中国愈來愈無法理解。現在中國穩定了，所以，無法理解的日子也應當結束。願中國出國代表團今後多做些切實而大有益處的工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

盛中國訪澳側記

幾個朋友看了那篇談中國代表團出國訪問的拙文以後，責備我老寫帶「刺」太多的東西。這話也大概對。回想我除了在澳大利亞上三年大學之外，還在中國上了三年「文革大學」，其中兩年就在「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白卷英雄張鐵生的老家遼寧，因此很可能受到感染吧？

中國派到國外的代表團實在太重要了。除了有關中國的零零星星的新聞報道外，只有中國派出的代表團能夠在海外提供輿論的素材。另一方面遊華旅客甚衆，但旅遊畢竟是少數人的享受。在中國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也並不是某某外國大臣在華受到的官方隆重歡迎；或鳳毛麟爪的國際新聞，而是脖子掛照相機、胸佩新買的毛主席像章、頭帶軍帽的外國遊客。這些非正式外交使者，在中國大城市裏是最明顯的外國「貨」，所以印象很深。至於這

個印象如何？會造成一些什麼社會問題？需要專文討論。

楊憲益參加的中國作家代表團，是以老一輩文藝工作者的質樸坦誠，打動人心的。

接踵而來訪澳的還有一個中國「代表團」，沒用語言來自我介紹，也沒有代表老一輩的文藝工作者發言，他是一個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破土而出、新中國培養出來的青年藝術家——中國小提琴家盛中國。

三十九歲的盛中國，應澳大利亞廣播局之邀來這裏進行十天的訪問演出。他在北京中央音樂團工作，並非黨員，一個人能夠出國訪問，前此似不多見。盛中國在堪培拉只演出一次。我去聽了，不料演出結束後，又經朋友介紹，被他拉到他住的旅館，閒談了一通。

在表演時我就發現，雖然他的小提琴演奏並不是非常出色，但他的演技和舞台表情相當吸引聽眾。那是一種不受國境或文化背景限制的國際語言。我從不同的評論文章中，知道盛中國的演奏表現了一種人情味的精神。至於演技，

十幾年的與外隔絕和冷遇，不無影響。

我在盛中國的旅館談話，就像我在中國同朋友談話一樣。很快就在談笑之間發現，他同中國許許多多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一樣，是把他的藝術——他表現的最主要形式，音樂，同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命運連在一起的。他的藝術不是抽象而遙遠的，而是內心的深刻表露。他談到他對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時說，雖然這作品的基調是憂鬱的，但他表演時，力求強調柴可夫斯基對光明、美滿境界的渴望，以他個人的特異理解，把十九世紀歐洲作曲家的作品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聽眾演出。

盛中國雖也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但若沒有經過「文革」驚心動魄的過程，他也許不一定會像現在這麼強烈地感到藝術的社會屬性作用。像盛中國這樣的藝術家，包括作家在內，能夠多出國了解情況，善加比較，那麼，目前中國藝術生活雖略顯平淡，但它那巨大的精神潛力也許會看得清楚一點。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

後記：鏡下殘照

白杰明

洋人幹嗎要用中文寫文章？能行嗎？不但有人這麼說，我自己也時而自忖，硬去用中文出文字洋相何苦也！不過我還是寫了這幾十篇中為洋用的小文章。現在將之匯成集子，供甘心挨二茬罪以及落網讀者噴飯搖頭之用。其實，我用我的母語——英文——寫東西，效果並不理想；本來也不該用一種掌握得不怎麼理想的外語寫文章加害於讀者。但是，我如此做，無非是因為我很想將自己在跟中國打交道（有時候真像肉搏）時所積累的一些想法和感觸寫出來給中文的讀者看。結果，寫出了五十篇不東不西的小品文。寫，對我來說問題不太大，經過一番胡思亂想總可拋出點貨色來。難得的反而是朋友的支持和讀者的青睞。這種種很可能是拙文的「異味」所招致的。其「異」者不外於新奇、稀罕，但並不一定是好東西。但讓這些洋品種移植中國人素來筆耕的園地

我看較有趣。這個「移植」有它的難處，千字上下的文章常有洋文異字的痕迹，幸而有知音糾正其誤，予以登大雅的機會。五十篇中三分之一的文章曾在《大公報》的《大公園》獲亮相良機，這都是《大公報》潘際炯先生鼓勵和協助的結果。

此書可說是一本鬼話連篇的集子，所謂「鬼話」不作謠話、無稽之談解，而應該說是一個「鬼佬」連珠炮式的雜亂作品的意思。原先考慮以「鬼話連篇」為書名，但又想港、台和中國內地以中文炮製「鬼」話「鬼」文的人遠遠不止我這區區「外人」。拙作亦在許多長輩雅文相形之下大大地顯出其鬼話之不足，故異想天開，命之為《西洋鏡下》。胆敢來個西洋鏡，不僅因為我想托其「洋」字之福，而且通過兩年來的寫作，經常拿這面鏡子你我拆穿，不亦樂乎。

中國人（我同許多朋友一樣對「外國人」這個籠統而不確切的字眼很忌諱）用中文撰文，時而伏案疾書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思想，時而舞文弄墨來逗趣的事寫的這些文章實在不嚴肅，但雖不能載什麼道，我想它們仍然足以達意。非中國人（我同許多朋友一樣對「外國人」這個籠統而不確切的字眼很忌諱）用中文撰文，時而伏案疾書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思想，時而舞文弄墨來逗趣的事

恐怕不多。但由於用非常漂亮的英文寫文章的中國人觸目皆是，不免心裏想這件事雖好，但豈非西方各國過去的「單行路」——文化科技灌輸主義的極不平等的結果哉。我就來「雙程」一下。

自六十年代中澳大利亞出現了一種思潮，鼓勵國人把死盯在遙而又遠的歐美文化、政治和經濟的目光轉移到我們亞洲鄰邦上去。當時的反侵越戰爭運動，無視長輩及其價值觀，和東方文化、宗教熱均有助於年青人發現澳洲的確離歐美甚遠而同亞洲數國擦肩。我自己也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我中學大學有的跟我一樣學習中文）和亞洲文化，因此找到了跟他們學習有關係的工作。我的哥哥在泰國、印度和菲律賓過了數年的「嬉皮」生活後，回到了澳大利亞開始學習泰文、印尼文和東南亞歷史。我們和許許多多其他人一樣贊成澳洲面向亞洲，不再拘泥於十九世紀的懷「故國」夢，要逆轉「單行文化」的激流。今後會有愈來愈多的人去學習中文，去了解曾被恐怖和神秘的幃帳籠罩的中國。

西洋鏡下

白杰明著

(Geremie Barmé)

出版：波文書局

Po Wen Book Co.,

灣仔道234號地下

234, Wanchai Rd., H.K.

P.O.Box 23066, Wanchai P.O.,

H.K. 5-753618 753690 721195

發行人：黃孟甫

印 刷：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西安里十三號地下

發 行：天天圖書發行公司

5-699486

植 字：建成植字製版公司

北角英皇道387號4樓A座

定 價：\$12.00

一九八一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那空中樓閣的中國越來越近地面，中國內外的廢話輿論工具的威力日減，只有這樣才能夠打開中外溝通的途徑。有相互來往和認識才會互相了解。這些話談遠了，請見諒。

總之，這些文章都是觸景生情的東西。現在讀起來很多有時過境遷之感。現在已經是一九八一年，沒寫啥永恆的主題，過時了我亦無可奈何。

這個西洋鏡所照出來的東西若沒有友好鼓勵我寫，永遠會像兔子頭上的角，空影子罷了。我冒洋人寫中文此不大不小之不謬的原動力乃是好友韋妮，她和她夫婿吳承歡先生，給我以啓發和精神上的支持。動筆是韋妮鼓舞所致，至於內容、質量和可讀性，看來這個文責只好由我負罷。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於東京